

中蘇文化之交流

蘇建可



流交之化文蘇中

著 若 沫 郭



3 0580 9354 7

知新·書讀·活生

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

序

這兒所蒐集的十九篇小文章，是好幾年來，斷續地寫成的，有好些已經收在別的集子裏面，但我現在爲了讀者的方便，把它們「方以類聚」地集成了這個小冊子。從這裏可以看出中蘇文化之交流上的一些局部的切面，至少是我自己的一點管窺和非見。

中蘇兩國的關係，特別是文化的交流上，今後は會愈加密切的。蘇聯的民主文化，有一日千里之勢的進程，而我們應該向蘇聯取法的地方實在很多。我自己很慚愧，並不通曉俄文，因此對於這樣重要的關係，以往不會有，今後也恐怕不能有多麼大的貢獻。

但我要誠懇地奉告青年讀者：最好不要再蹈我們的覆轍，請把關心英美文化

的程度，至少分一半來關心蘇聯文化吧；請把學習英美文字的鐘點，至少也分一半來學習俄國語文吧！蘇聯的文化毫無疑問，在某些方面已經駕過英美，在不久的將來，在一切方面都會駕過英美的。我們只要不想落後，無論社會科學方面或自然科學方面的朋友，都請注意到這件事情。

整整三年前，我曾經去蘇聯遊歷過一次，回國後寫成了蘇聯紀行一書。那本小書至今似乎都還可以一讀。因此，我要學毛遂自薦：請讀這個集子的朋友也把那個小書來翻閱一下，對於蘇聯文化的了解是不無小補的。

郭沫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於香港

目次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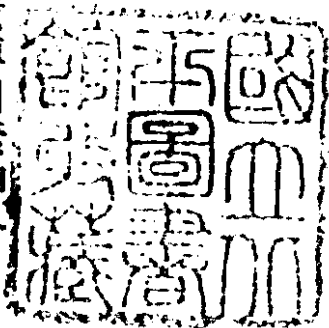
中蘇文化之交流	一
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	一〇
答「國際文學」編者	三〇
活的模範	三五
追慕高爾基	四〇
契珂夫在東方	四九
悼念 A·托爾斯泰	五五
向普希金看齊	六一
序「不朽的人民」	七〇

「亞洲蘇聯」序	七五
序「蘇德大戰史」	七九
讀了「俄羅斯問題」	八七
看了「侵略」	八九
出了籠的飛鳥	九三
學習歌頌不完的偉績	九七
奉行國父遺教，向蘇聯看齊	一〇〇
蘇聯問題二三事	一〇八
世界和平的柱石	一一三
駁胡適「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	一二一
附錄一 歷史要重演嗎？（周鯁生）	一四五
附錄二 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胡適）	一五三

中蘇文化之交流

文藝是現實的反映，生活的批判。各個民族因為有他們內在的遺傳因素和外在的自然條件的不同，便會形成一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由這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產生出各種有特殊性的意識形態。文藝便是這其中的一種。各個民族的文藝在或多或少的差別性上是有他們的獨特的內容和風格的。因而民族文藝的交流可以使文藝形態的多樣化，且更能動的地使民族生活交互受其影響而生變革。

中國的舊文藝，受印度的影響最深，繪畫、雕塑、建築等造形美術部門是顯而易見的。音樂，自南北朝時代以來，起了一番劃時期的革命，事實上是以西域（特別是龜茲等國）和南詔為媒介，間接地受着印度的影響。文學方面也是同樣，而以詩歌及戲劇文學為最著。詩歌，無論是所謂貴族形式的文言體或所謂民間形



式的白話體，都深刻地表示着印度的烙印。唐宋詩人多感受着印度的佛教思想，是無庸例證的事實了。唐宋以來的民間文學，自燉煌所存的唐代的「變文」多數發現以後，那烙印的深刻逕直可以驚人。「變文」是韻文和散文相間的一種講唱體，起初大概是用以演變奧澀的佛經，即佛經的通俗化，後來並用以演變民族故事。那形式在中國是嶄新的，毫無可疑的是由印度傳來。待傳到中國，用以演變民族故事的階段，便成爲了中國的有力的民間形式了。以後的寶卷、彈詞、鼓詞等不用說是淵源於此，就是明清兩代的幾部章回體的小說傑作，我們敢於相信也是從這兒禪變出來的。

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藝，是促成於歐美近代文學底多量介紹，但如耶教聖經的白話翻譯，我相信也是有着助產作用的。歐美文學，其國別的對我國新文藝的影響，依文藝部門而不同，但如以小說而論，俄國文學的影響，無疑地是佔着領導的地位。俄國舊時代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抵是被翻譯了。果戈里、屠格

涅夫、安斯退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珂夫，這些作家的名字，對於中國的文藝工作者，與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吳敬梓、蒲松齡等有同樣的親切，甚至還超過他們。

近十年來的關於高爾基的介紹，尤其值得振筆特書的。他的影響逕直是超文學的。他被中國的作家們崇敬、愛慕、追隨；他的生活被賦與了神性，他的作品被視爲了『聖經』，尤其是他的文學論，對於中國的影響是決不亞於在蘇聯本國。文藝工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創作過程，普遍而深切地受着了指示。我們藉此不僅可以知道應該如何去創作或創作些什麼，而且還學習了應該如何生活或成爲一個怎樣的人。高爾基在我們文藝工作者的精神上所佔的地位，在中國長遠的文藝史上，似乎還找不出一個人可以和他匹敵。

中國的舊文藝對於別的民族的影響，就遠東方面來講，斷然地是燦爛可觀的。如安南、朝鮮、日本，可以說整個是受了我們的感化。但除掉這幾個國家外，對

於印度對於歐美的反響，無可諱言地便沒有這樣的強烈了。尤其是近代，文藝的交流，差不多僅是片面的。就拿中蘇兩國間的文藝關係來說，由蘇聯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品可以說是洪流；由中國介紹到蘇聯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條溪澗。我們知道，魯迅、茅盾、丁玲和若干東北作家的作品是被翻譯了，而且是備受着歡迎，但無論從質或量上來說，是斷難同俄國文學成對比的。我這樣說，也並不是故作撝謙或者有什麼芥蒂，我只是照事實說，照個人的感想如實地說，我相信這個事實是為我們所有目共睹的。發生這個事實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由於中國新文藝的歷史，為時僅僅二十年，在這樣短促的期間不會有多量的傑作出現。但是作家的修養不夠，技術水準不高，努力不足，似乎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主持文藝教育或行政的人，不能從高處遠處着眼，不能全盤地有計劃地從事於作家的培養、作品的獎勵，去促進文藝的發展，補償落後的缺陷，反而每每發揮着掣動機的效能，似乎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為文藝的前途着想，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這些

礙難令人滿意的事實，我們極誠懇地希望能夠把它們改正過來。我們應當加緊的直追，然後才可以補償我們的落後。我們不僅是落在世界偉大作家的後面，而且是落後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的偉大事件的後面。記得高爾基曾經鼓勵過蘇聯作家，要他們以中國的歷次偉大事件為題材。我們身為中華民族的兒女，生在偉大事件的激流當中，我們是應該起一種怎樣的責任感呢？

爲要補償這些缺陷，在我們應該努力的方面自然很多，但在如何促進中蘇文藝的交流上，我們是懷抱着誠懇而迫切的期待的。俄國文藝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尤其是那所反映的寶貴的革命經驗。以前的介紹是無系統的無計劃的，革命以後的文藝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也還不多。而且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作品的欣賞和觀摩，我們所需要的應該還要加上作品的創作過程和作家的處理題材的方法與生活態度。這樣的要求僅靠文學的介紹是難得滿足的。就從蘇聯一面來講，蘇聯對於我們中國的關心，可以說是到了至矣盡矣的程度。蘇聯的朋友們同樣迫

切地需要中國的作品，這一方面固然出於他們的前進不息的精神，企圖由中國作品中無論從形式或內容方面，吸取應有的營養，以促成文藝更高級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也是飢渴着中國作品所反映着的中國的現實——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要從文字方面來滿足蘇聯朋友們的需要，我們很慚愧，我們的筆實在未盡能緊緊地追隨着我們偉大的現實。因此我們除作品介紹之外，也應該還要考慮別的方法來滿足這樣的要求。

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作想：

一、我們希望中蘇兩國的文藝工作者今後能夠經常地交互聘問與交換講學。以前有位俄國作家愛羅先科曾到過北平，和魯迅及其他的人發生過美好的交誼，他在北平也講過學，他在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史上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功績。我們更想到杜威、羅素、太戈爾之來華講演所留下的影響，我們禁不住有對於蘇聯作家或文化人來華講學迫切的期待。至於由我們中國向蘇聯的貢獻，這一次有我們文

化大使邵力子先生的聘蘇，受着全國朝野上下一致的支持，我相信一定有相當的禮物帶到我們的友邦去的。我們的友邦對於邵大使一定會有超度的歡迎，歡迎他所帶去的中國學問和中國現實。

二、我們希望中蘇兩國的文藝藝術團體今後能夠經常的相互往來並交換表演或展覽。最近蘇聯方面所舉行的中國美術展覽會，在莫斯科大受歡迎，這是極有意義的措施，在我們是值得效法的。由無線電的兩國音樂演奏的交換，也於藝術價值之外，增加了二大民族的感情的親密。但我們因而更增進了對於有血有肉的人的接觸要求，我們如能達到兩國的藝術集團經常交聘的地步，豐富彼此的經驗，增加彼此學習的機會，所表現在各方面的效果必然更加宏偉的。記得在蘇聯為美術展覽會徵集中國美術期中，曾經有過中國演劇集團聘蘇的提議，結果因為人選問題未能實現，覺得是很可遺憾的事。以人材本位為原則，凡真正足以代表現階段的某藝術部門的人，都得膺選，應該是毫無問題的。「公生明，偏生暗」。只

要純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一秉大公至誠的態度，問題便會明朗化了。

三、我們希望着中蘇兩國的文藝能夠更有計劃更負責地不斷介紹與翻譯。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乃至他的作品全部希望有至善的移植。例如高爾基作品的全部，我們便希望翻譯到中國來。但執行這種計劃最好是要有統籌的機構，而且還需要中蘇兩國人士的通力合作。除作品本身之外，作品產生過程的創作方法，也需要盡量介紹。離開文藝立場來作一個譬喻，這個要求便更易明瞭。譬如我們需要蘇聯以工業生產品來幫忙我們，但我們自己是不是有進一步去學習生產方法的必要呢？我自己有一位朋友是兵工廠廠長，他就託過我徵求蘇聯的關於工場組織法之類的書；又有一位研究農業改進的朋友，他也囑咐過我徵求蘇聯集體農場的方案。文藝作家們的要求，應該不是兩樣的。或許有人會說：文藝的創作並不同於農工業的生產。但那種觀念是已經相當過去了。文藝創作，我相信是同樣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促進的。快速度的藝術機械化部隊，如電影，更是明顯的例證。

以上拉雜地根據大家的意見和個人的感想，我寫出了一些希望。這些希望當然是希望他們不要僅是希望。爲要實現它們應該還要有詳細的步驟，這要讓別的專門的朋友來設計，不是我個人所能周慮，也不是這篇小文所能詳述的；但我懷抱着極誠懇的熱望，預祝中蘇兩大民族更密切的融洽與兩大民族的文藝之間更高階段的發展。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〇日

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

——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在中蘇文化協會講

主席，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今天中蘇文化協會舉行講演會，要兄弟先來講中蘇文化之交流，這個題目非常宏大，範圍廣泛無量，各位不用說都是很瞭解的。文化的範圍很廣闊，凡是人爲的一切進步的事物都應該歸在文化範疇裏面。再從歷史上來講，我們中國的文化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並不是從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才有，實際是自有中國歷史以來就有中國的文化；同樣，蘇聯的文化也不是從蘇維埃成立以來才有，自有俄羅斯歷史以來，就有蘇聯的文化。範圍既這麼廣闊，中蘇兩國的歷史又那麼長

遠，要來敘述兩國文化的交流和兩個國家彼此間的關係，這是一種巨大無比的事體。假使寫成書，應該可以寫成幾部大部頭的書。這樣大的題目，而且要在短時間內小規模地講，恐怕要超人的本領才行。我是沒有這種本領的。文化的範疇既太大，我所知道的範圍又太小，認真說，我對於中國文化都還不曾作過有系統、有把握的研究。對於蘇聯的文化，自然更不用說了。我要向各位承認，連蘇聯文字我還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來講這樣的題目，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過，我們的講演會今後要按月舉行，所講的範圍，還是不外中蘇兩國文化交流的問題，尤其是今天還有西門宗華先生的講演，西門先生是專門研究蘇聯問題的，關於蘇聯的資源有大部的著作，今天一定有很精彩的材料貢獻給各位，不致使參加今天講演會的人感覺失望。兄弟現在不過是來唱開鑼戲。我們鄉下唱戲最初一齣是最壞的戲，只是用來邀集觀眾。最後一齣才是名角的壓軸戲。因此我不揣冒昧，斗胆地擔任這個題目，搜索自己的枯腸，來向各位敘述自己所知道的一點東西。各

位都是文化界的中堅分子，我所知道的，各位一定也知道，不過我們中國的古人說過：『溫故而知新。』從舊的東西裏面，也許可以發現新的意義。當然，我不敢說，我所講的一定有什麼新的意義。錯誤掛漏的地方還得請各位指教。

中蘇兩大民族集團，在目前的關係，可以說再密切也沒有了，從歷史上講，中蘇兩國有過長遠的相互交往的史跡。從地理上說，這樣壤土相接，國境如此綿長的，更是沒有。中蘇兩國可以說是真正的隣居。兩國文化交流，並不是近代才開始，應該說，中蘇兩個民族自有文化以來，就在互相交流着。關於這方面的史跡，蘇聯文化界也許有很精密的研究。中國方面對於這種史實的研究，似乎還沒有人注意。說這問題不值得研究嗎？說這問題沒有研究的材料嗎？那絕對不是。依我個人看，有兩件重要事體值得今天提出向各位報告。這將給予中蘇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一個有力的證明。

我們知道中國殷周兩代是青銅器時代。殷周兩代遺留下來的青銅器。經過歷

來學術家的研究，有銘文記載的已有九千件。所以近來關於青銅器的研究，不僅在國內，就在歐美各國也成了很時髦的學問。根據我個人的研究，殷周兩代青銅器發展的歷史，約略可分爲三個階段：殷末和周初是一個階段；西周末年和春秋時代是一個階段，戰國時期又是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根據什麼來分的呢？是根據青銅器的形式、花紋，銘文的字體、文體，和所記載的事實。在第一階段，青銅器形式非常古樸、花紋非常奇怪，字體非常凝重，還沒有脫離原始的風味。到第二階段，形式變了，從前凝重的現在變得量既輕，質也退了步，花紋也祇是粗枝大葉的幾條，第一階段的原始風味完全消失了。到了第二階段又突然不同，花紋變得非常清新流利，類似後代的工筆畫；同時寫生的動物性的東西，也出現了，形式也變得非常輕便。這三個階段的青銅器，確是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的特徵。

青銅器的變化當然有他本身的原因，應着歷史的進展和先民知識的逐漸開

發，自然各個階段有各個階段不同的形式。但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無論哪個民族的文化，在變革時每每有外來的潮流參加進來，外來的文化成爲觸媒，成爲刺激，對於本國文化引起質變。在青銅器變化階段的研究裏面，就有這種情形。史基泰美術的研究家羅斯安吾契夫（Rosonoff）發現戰國時代的青銅器花紋，和蘇聯境內古代史基泰民族的文化有類似的地方。史基泰民族在中國春秋時代發展到西伯利亞南部貝加爾湖一帶。近年來蘇聯考古學家對於史基泰民族的古物發現過很多。我曾看到過此類古物的照片，和戰國時代的花紋形式上的確有許多類似的地方。當然，這種發現還沒有得到全世界公認的地步，不過兄弟是傾向於承認這種學說的合理性的。因爲我們知道中國戰國時代在歷史上曾和外族發生過密切的交涉。有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就是吸收北方民族的生活習慣，來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在改革的時候，內部還起過劇烈的論爭。所以我相信中國戰國時代，經過蒙古的中介，很有可能接受史基泰民族的文化。這接觸開始於北部

幾個國家，接着進行到當時的七國。所以戰國時代各國的銅器，都成了那種形式。

據這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中蘇兩國文化相互流通的來源很久。同樣，我們中國文化影響到蘇聯的，在歷史上也斑斑可考。譬如十三世紀蒙古民族把中國全部佔領了以後，他的勢力發展到了歐洲中部，現在蘇聯大部分的領土當時曾為蒙古民族所佔領。特別是一二三八——一二三九年的時候，蒙古大將拔都率領東方軍隊第二次西征，一直打到中歐。蘇聯現在的莫斯科、基輔，都為拔都的軍隊所佔領。拔都在東歐洲建立了欽察汗國，在裏海北岸一帶統治了二百五十年。這段歷史凡屬對於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同時我們也知道隨伴着蒙古人的西征我們東方文化也到了歐洲。如中國人發明的活字、指南針，及打仗離不了的火藥，都是那時傳到歐洲去的。這三種東西傳到西方去了以後，把歐洲的近代文明發酵出來了。這史實也是世界所公認的。那麼我們可以揣想，除了上述的三種重要的東西之外，應該還有許多次要的東西也輸到了歐洲。假使對這個

問題有興趣的朋友，肯下工夫研究在歐洲東部，特別在現在的蘇聯境內，無論語言也好，生活習慣也好，一定可以找得出中蘇兩國在十三世紀初期文化溝通的痕迹出來。關於這層，兄弟毫無研究，祇是有此預感而已。蘇聯方面一定很有研究，不過兄弟剛才說過，我是不懂蘇聯文字的人，中國方面也沒有關於這類問題的著作。這類問題研究起來，我相信很有趣味，而且從歷史上來研究，對於兩國文化彼此間的關係更能得到親切的瞭解。所以兄弟個人懇切地希望無論蘇聯朋友或國內朋友，今後對於兩國文化交流史的檢討方面，切實多做一點工夫，這對於今後兩國文化的交流必有大的幫助。當然，對於近代兩國文化交流之史的檢討更有必要，那是不用說的。

講到近代中蘇兩國文化的交流，那是更有顯著的痕迹可尋，特別是關於文學藝術方面，我們大家都有深切的認識。近代蘇聯的文學藝術無論他們的思想、作品乃至作家的歷史及其生活習慣，可以說像洪水一樣汎濫到了中國，中國也最關

心蘇聯的文學藝術。以量來講，恐怕比來自英美的還要多。這不是兄弟一個人信口開河，我們祇要把中國近二十年來出版界的情形調查一下，就可知道。關於俄國有名的大作家，無論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差不多都介紹到中國來了。如果戈里、屠格涅夫、安斯退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珂夫、萊蒙托夫、普希金以及其他許多作家介紹到中國來的很不少。不僅介紹到了中國，而且曾給予中國文藝以極大的影響，其中以小說方面的影響最深刻。中國近代小說的產生，在所受外國影響中，以蘇聯的影響最大。其它詩歌戲劇方面要稍為遜色一點。不過小說在近代文學中居領導地位，所以我們說中國的新文學受蘇聯的影響最大，並非過言。比較起本國作家來，中國作家似乎更知道蘇聯的作家。如果問我們的文學作家蒲松齡怎樣？羅貫中、施耐庵如何？儒林外史是什麼人作的？恐怕有很多人說不出來；但如果你問托爾斯泰、安斯退也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如何？思想如何？身世如何？他們說得頭頭是道。這足以證明蘇聯文學和中國文學關係的親

切。爲什麼會有這種情形的發生呢？這是因爲我們中國前一代的偉大作家，在歷史上固然有他們的地位，他們的作品固然有永不可磨滅的價值，值得我們寶貴，但古代人的生活 and 現代人的生活究竟不同。我們處在現代，作爲現代人，接受中國古代人的作品，還不如接受其他國家現代作家的作品來得容易。這種現象不僅中國爲然，日本也是如此。兄弟在日本住了二十年，對於日本的情形比較明瞭，日本人對於本國歷史上的作家和本國有價值的作品差不多也都不懂得，而對於西方的蘇聯和歐美作家的作品却非常清楚。這是時代使然，並不是中國現代的作家數典忘祖。這是兄弟在這裏要替我們現代文學家辯護的。不過，我們也不能完全把中國先代有價值的遺產拋棄不顧。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住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用中國的文字寫東西，如果一味膜拜外國，模仿外國，說外國壞的也是好的，那也不對。所幸這種風氣已慢慢轉變過來，這不能不感謝快要與我國古代偉大詩人屈原同於六月十八日紀念的高爾基的啓示。高爾基在蘇聯提出重估文學遺產，接

受文學遺產的卓見，我們中國作家也同樣地將目光凝注到中國舊有的文學遺產，這是值得我們欣幸的。

其次藝術方面，蘇聯所給予我們的影響也很大。今天在座有好些木刻家，恐怕不能不承認中國的木刻界全靠蘇聯木刻界的觸媒與刺激。因有蘇聯木刻界的觸媒與刺激，我們的木刻才得風起雲湧，蓬蓬勃勃地成長起來。其他我國政治上、軍事上的機構，好多都是採取蘇聯的制度，這也是人所共知的，如軍隊裏的政治部，便是來自蘇聯，政治上的委員制與主席制，在世界各國中，祇有中蘇兩國採用，而創造者即是蘇聯。所以無論政治上、社會上、文學藝術上，近代中蘇兩國的交往非常頻繁，蘇聯給予我們的影響非常巨大。

講到這裏，有一點使我們感覺遺憾的，特別是中國人感覺遺憾的，就是這交流祇是片面的。蘇聯文化給予我們的影響，真是浩浩蕩蕩像洪水一樣向我們中國奔流，而我們中國的文化輸到蘇聯方面的怎樣呢？這，說起來真叫我們慚愧，兩相

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關於今天所講的同樣問題，兄弟前年曾經根據許多朋友的意見，寫過一篇文章，在蘇文化雜誌上發表過。發表後有蘇聯的朋友把它翻譯了過去，在蘇聯方面引起了極大的同情與反響。在那篇文章裏，我說蘇聯文化流到中國是洪流，中國文化流到蘇聯的，則如溪澗。這兩句話特別引起蘇聯方面的注意。蘇聯研究中國學術的權威儒林外史譯成俄文的伊文先生，就用洪流與溪澗的題目作過一篇文章，在蘇聯文學報上發表。他在文章裏不但同意我的說法，另一方面很責備蘇聯方面的朋友。他的解釋是我們介紹蘇聯文化用了很大的力氣，蘇聯對於中國文化的介紹卻沒有用力，特別對國際文學的編者羅果托夫先生責備得很厲害，並且統計國際文學介紹其他國家文學的百分比和介紹中國文學的百分比來責難國際文學對中國文化的介紹沒有盡力。這對羅果托夫先生真是有點委曲。他曾向我寫過三次信，說今後要特別請我們幫忙，盡力介紹中國的東西，絕對不吝惜國際文學的篇幅。伊文先生站在蘇聯方面指導者的立場，站在研究中

國文學權威者的立場，作出那樣的責備是應該的；站在我們中國方面的立場來看，實在非常慚愧。因為並不是蘇聯朋友介紹我們的東西不努力，而是我們值得介紹的東西實在太少。這並不是說中國歷代的東西都不值得介紹，只是說近代的中國人太不努力罷了。蘇聯方面對於中國古代的著作介紹的也可說像洪水。這次我為今天的講題搜集了材料，問到米克拉舍夫斯基先生和費德連柯先生關於蘇聯對於中國古代作品的研究，他們寫了一個很長的清單給我，現在我把它唸一唸：

論語

一八八九年華西列夫第一次翻譯

一九一〇年巴薄夫第二次翻譯

詩經

一八八二年華西列夫譯

春秋

一八七六年馬納斯替列夫譯

孟子

一九〇四年巴薄夫譯

聊齋誌異

歐陽修

李白

杜甫

陶潛

司空圖研究（以所著詩品爲主）

以上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〇年蘇聯研究院會員阿列赫葉夫選譯並編著

儒林外史 一九四〇年伊文譯

白居易 一九四〇年伊特林譯

中國歷史 一八二九年比丘林譯

王弼 一九三八年彼得洛夫譯

由此看來，足見蘇聯對於中國文化也並不忽視。我們中國人認爲有價值的東西，蘇聯同樣認爲有價值。這在我們中國人當然是值得誇耀的。我們的祖宗留下許多寶貴的遺產，爲我們隣邦所特別珍視，這是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先人，並且，也感謝我們的朋友的。不過，同時也令我們慚愧的就是蘇聯介紹的都是古代

的東西，近代的非常少。在這清單末尾祇列了魯迅、茅盾和我的名字，對於我恐怕還是一種客氣。因此可見，我們從蘇聯介紹過來的特別多，從中國介紹到蘇聯去的特別少。所以洪流與溪澗並不是擬於不倫。

文學方面的情形如此，藝術方面怎樣呢？大前年中國有一批美術作品運到蘇聯展覽，在莫斯科展覽之後，再運到列寧格勒，參加的人非常多，在蘇聯方面引起了極大的興奮。運到蘇聯去的美術品新舊都有。關於這事，兄弟曾參加籌備，對於內容約略知道一點，新舊作品比較起來，舊的分量遠在新的之上。因為我們也知道新的作品實在趕不上舊的作品。蘇聯方面的一般觀感也是舊的較受歡迎。換句話說，近代的作品不值得人家用全力來鑒賞，介紹，這是我們應該引為慚愧的。

由此看來，兩國文化實在是片面的交流。在這一種情勢之下，我們怎樣使交流趨於平衡呢？當然，我們一方面仍要盡量介紹蘇聯方面各種文化的精品到中國

來，因為蘇聯方面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太多了。我們以前作的工作事實上還是不夠，我們應該更有系統地，更有組織地，更負責任地來作，使以往的洪水更能澎湃澎湃地奔流。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中國的文化像洪水一樣的奔流到蘇聯去，所謂『禮尚往來』，我們不能專門拜領人家豐贍的餽贈而毫無酬答。但是如何才能使這種偏頗的現象趨於平衡，如何才能使以往的涸溪成爲洪流呢？這個問題我看也很簡單。我們到不在乎把已成的現代作品大量地翻譯到蘇聯去，假使有價值的當然可以，否則翻譯過去別人家不願接受又有什麼意思？因此我們今後要盡量產生值得人家介紹、值得人家研究的東西，像我們古人的作品一樣，這是我們近代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中國人的責任。今天因爲是以中蘇文化之交流的題目說話，所以側重蘇聯方面，其實對於英美各國也應如此。我們不僅文學藝術落後，科學方面也是趕不上人家，所以我們應該特別努力地來推進各種工作，每一個作家都要產生能夠見人的作品，替國家民族爭一點光。這種好勝

心我們應該有而且值得獎勵。

說到要產生有價值的作品，尤其是有世界價值的作品，卻不是偶然隨便可以作到的事，這必須每一個作家加倍努力才行。中國作家，特別是中國有頭腦有聰明的文藝作家，在努力這一點上實在作得不夠。其他國家我不知道，日本人我是非常清楚的。日本人的聰明比起中國人來不知要差多少倍。但中國人正如我們的俗話所說：「聰明反被聰明誤。」大家都是馬馬虎虎，以為文章是吊而郎當作得好的。我聽到很多人說過：「我幹科學，頭腦不行，所以要幹文學。」這簡直是胡說。他們以為幹文學像吃豆腐那麼容易，這樣如何能夠產生好的作品？我們要產生好的作品特別在目前要迎頭趕上，一個人要作兩個人的工作，要特別刻苦，加倍努力。我們要怎樣努力呢？非常簡單，就是要研究，沒有研究就沒有創作，沒有研究就沒有一切。作文章的人特別要研究，不是腦筋中胡思亂想可以寫得出的。所以我們今後要各人站在各人崗位上努力，也可以說就是對中蘇文化的交流

努力，對各國文化的交流努力。在外國，別的國家剛剛出版的作品便有人翻譯過來，甚至在本國還沒有出版在外國就已經翻譯出版了（在本國出版以前先將校樣寄往國外翻譯），日本便有此例。祇要作品有價值，當然會被人家認識，這是九州萬國到處皆同的道理，也可以說是人類固有的正義感。

但我們今後要使我們的文化與各國真正的交流，除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切實努力以外，還有賴於國家及社會的鼓勵與愛護，替它開闢康莊大道，使它能勇往邁進。關於這層，蘇聯是我們很好的榜樣，不僅它的文藝作品值得我們做效，它的文藝政策也值得我們做效。他們用種種方法指導作家，獎進作家。蘇聯無論作家或演員，只要有成績和貢獻，都可成爲『蘇聯英雄』，好比中國話說的『行行出狀元。』我們應該做效這種法制。對於作家的氣質，兄弟敢說認識得相當清楚，一切作家沒有一個不是希望得到人家的鼓勵的，最怕的是挨罵。挨了罵，本來能寫三篇小說的，結果只能寫一篇，本來想寫長篇的，結果寫成短篇。寫作如同打仗，

要有氣勢，平常寫不出東西，祇要氣一來就可寫成。作家自己固然要養成這種氣，社會也要幫助他養成這種氣。對於作家的培養、愛護、獎進，蘇聯的辦法特別值得我們做效。說到這裏，對於中國批評家我有一點感想。一些批評家好似不批評則已，一批評就應該罵人，這種態度是根本錯誤的！這小之壓抑了作家前進的精神，大之損害了國家的元氣。還有些批評家喜歡用一種公式來責備作家，那更不對。對於作家我們最好讓他像大平原的樹木一樣，給它充分的空氣，給它充分的陽光，給它充分的養料，讓它自由在地發展，它才能成爲參天的大木。如果要摘掉它的葉子，剪掉它的枝子，盤曲它的根子，最多祇能成爲庭院裏的盆栽，作人家的玩具而已。一旦從盆子裏解放出來，無論你給它多少陽光，多少空氣，多少養料，再也長不成一個東西。根據這點膚淺的道理，我們希望我們的政策要從大處、遠處着眼，這不僅爲作家着想，也是爲國家社會着想。我們要求多樣的統一，不要求一色的同一。春天來了，千紅萬紫，百花爭放，多麼好看。要是祇有

一種花開，其餘一概不准開放，那多麼單調！又如音樂是由do, re, me, fa, so, la, si. 各種音階組成的，用各種音階互相配合，才能組成和諧悅耳的樂曲。要是祇用一個 \circ 調，便永無變化，那有什麼趣味。所以蘇聯的文藝政策是相當開明的。

不過蘇聯也並不是一切都能盡滿人意，從前也有過一種壞的風氣，有一種人專門用一種固定的公式來衡量作家的作品，即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這種風氣曾經流到過中國和日本。一個作家無論用什麼圈子——紅色的也好，綠色的也好，白色的也好，黑色的也好，……去套住他，總是不行的，所以蘇聯自高爾基的指示出現以後，把這種公式加以清算，將文藝從這個圈套裏解放出來了。高爾基在蘇聯提倡新現實主義，給予作家無限的生路與無限的自由。我認為作家能夠尊重現實，並能精益求精，深益求深，廣益求廣地作研究，適宜於浪漫主義的，就讓他寫浪漫主義的東西；他適宜於寫現實主義的，就讓他寫現實主義的東西，不要拿什麼公式或圈子加以範圍、限止，那是會有很好的成果的。中國從前

也中過這個公式批評的風氣的毒，兄弟便是被指爲浪漫主義者而被加以詬病的。我深切的感覺，自己十年來沒有作品產生，人家詬罵未嘗不是原因之一。本來文藝上各種主義並無優劣之分，祇有各人的氣質如何。心理學上說：人有內向型和外向型兩種，外向型的人偏於浪漫，內向型的人偏於質實。不過認真的說，和科學比較起來，文藝活動的本質就是浪漫主義的。可惜中國從前許多朋友不是如此的看法，甚至現在還有許多朋友一聽到浪漫主義還要罵人，所以兄弟今天附帶提及。

我誠懇地希望我們從事文藝藝術工作的朋友們大家努力，同時也希望社會人士要愛護作家，鼓勵作家，主持文藝政策的人要着眼遠處，給文藝作家以更多的空氣，更多的陽光，更多的養料。使他們能夠自由自在的發展。這樣才能有偉大的創作，才能加強中蘇兩國文化，乃至中美以及中國與任何國家間文化的交流，克服中國與各國文化交流中的一切偏頗的現象。

答「國際文學」編者

敬愛的羅托果夫先生：

你最近給我的兩封信，我都接到，讀了使我感受着非常的愉快和興奮。我那篇小論中蘇文化之交流，竟獲得蘇聯方面富於同情與理解的響應，真是極可欣幸的事，不僅是我一個人感覺着歡喜，同時凡是中國文藝界的朋友們都一樣的感覺着歡喜。

你所編輯的有世界榮譽的國際文學，數年來我是愛讀者的一人，雖然有時是斷斷續續的，苦於未能窺得全豹。它在國際上的，關於文藝與文化上的貢獻，是用不着我來頌揚的了。中國的新文藝與文化也承你不斷地介紹着，我們全體都是很感謝而受着鼓勵的。雖然有如你來信所說，尙有未能達到滿意的地步，但這不

能怪你，甯是應該怪我們。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者，事實上還是不夠努力，未能多量的產出可以使內外滿足的作品；其次是我們的聯繫太不夠了。你們在介紹中國文學上是有不少的困難的，但我們以前不會盡力的幫助過你們，這是我們該向你和蘇聯的一切朋友們告罪的。就因為彼此的聯繫不夠，我們在介紹蘇聯文學上也遭受着不少的困難，而且始終是斷片的，無系統的。因此我們十分誠懇地接受你的提議：加強我們中蘇兩國文藝作家間的直接的接觸。我們的朋友們都非常歡迎你這賢明的提議，我們以後要積極向這個指示努力，以補償我們以往的缺陷。

你向我提出的兩個問題，我現在就想就我所見到的，在這兒先行簡單的答覆你。

第一個問題：作為抗戰的結果在中國文學中以何種新的形式為最流行？這毫無疑問的要推報告文學。因為戰爭所給予作家的刺激是興奮。又因為抗戰以來文藝工作者多參加軍隊政治工作，必然地是需得以快速度來錄取戰地的情形和戰士

們的情緒。這種報告形式，嚴格地說起來，或者還不能算是文學，但它是最新鮮，最活潑，最富有刺激性，最能滿足後方大衆對戰爭的關心，因而也最受歡迎。不過這種傾向近來也漸漸起了變化了。因為戰爭的長期化，戰爭本身的強烈的刺激漸漸稀薄了下來，人們的情緒也由興奮的反射進而爲沉着的反省，大家所關心的不僅是前線上的旅進旅退了。如何方能使戰爭持久而獲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維繫與加強，吸引了一般更大的注意。因而作家的筆也傾向批判的反省上來。以這同樣的契機，在文藝的各個部門中，都起着同樣的變化。大抵在初期，詩歌是最流行的，獨幕劇次之，小說則幾乎絕跡。這和戰前的情勢正相反，但目前的情形差不多要恢復到戰前的狀態了。目前小說家的筆活動了起來，而且多數的作家都有準備着手長篇的企圖。劇作家亦傾向於格局宏大的多幕劇，——在這一方面頗有相當的收獲。詩歌已偏於敘事，且多尙長篇，這種趨勢無疑地只是豫兆小說的復興。

第二個問題：中國讀者對於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的新的關心是怎樣？關於這個問題我很抱歉，我差不多沒有什麼材料可以答覆你。抗戰以來，翻譯家的筆幾乎普遍地停頓了。海岸線被封鎖，外國文學作品很難和我們見面；而且能和我們抗戰需要相適合的作品似乎也很少。因此，除一部份蘇聯作品，時時仍被介紹，被歡迎之外，其他幾乎沒有什麼可以陳述。戰爭的強烈的刺激，多少是壓倒了一般的對於文學的要求，但這要求近來漸漸的復活了。尤其是在作家方面，處到了比較能夠靜觀，能夠批判的地位，創作慾活動了起來，對於外國作品的需要也便漸漸地感着迫切。我們需要營養，需要模範，需要先生，我們已經有了極豐富的素材，我們還得學習怎樣至善地來處理這些素材的方法；模範、先生，我們差不多一致地期待着，要在蘇聯的文藝和作家裏面物色。理由是可以不必縷述的，我只誠懇地希望你和一切的蘇聯的朋友能夠幫助我們。凡是蘇聯的文學、藝術，乃至一般的文化，都是我們絕好的滋養品，我們希望有能夠多多接近的機會。

最後，我要向你告罪，這封回信，拖延的時間太長，恐怕累得你等了許久。因為這兩月來，適逢我所隸屬的政治部的改組，我一方面要交代以往的業務，一方面又要籌備新的組織，因此得不到多的時間來靜靜的思索。這封信也是斷斷續續地才寫到這兒的。請你原諒我，但我要向你保證，今後我一定要做出在這封信裏面我所向你提出的諾言，在溝通兩國文化上我要盡我最善的努力的。希望你以後不斷的指示。你有什麼需要，凡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我都樂意聽你的驅策，請你絲毫也不要客氣。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

活的模範

本文乃紀念高爾基逝世五周年之講演稿，曾於六月十八日中蘇文化協會高爾基紀念會上宣讀。

友人多要求發表，承新華日報記者之索，遂以付之。

作者識 六月二十日

在勇敢者和精神雄壯者的歌頌裏，你永遠是：活的模範，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

號召！

——鷹之歌

高爾基的逝世到今天已是第五個週年了，全世界擁護自由，熱愛光明的人都
在紀念他，紀念這位「活的模範」，嚮應他的「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號召。」

高爾基是死了嗎？不，他在追悼法國的一位文藝戰士亨利·巴比塞的死時已
經就預先回答過我們，給了一個堅決的否認：

當世界無產者運動的一位戰士和這種生活別離——停止了他的努力的時候，你不能够說他是死了。你感覺到這並不是真實的。對於如像亨利·巴比塞這樣的人，他們死的日期是他們的生平的工作結果的開始，其革命特徵的強度化。

高爾基不用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無產者藝術中巨大的正號」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高爾基是永生了，他的死確確實實是他生前事業的「革命特徵的強度化」。我們現在姑且單拿他的著作的發行數目來證明吧。

據最近塔斯社的消息：高爾基的著作在蘇聯極受歡迎，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僅僅二十四年間，已發行俄文版三千五百五十萬冊，其它六十五種各族語文版五百餘萬冊，合計四千零五十餘萬冊。我手裏有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統計數目是三千八百五十七萬另八百九十七冊。最近兩年間算是增加了兩百萬冊。這和沙皇時代的比較是怎麼樣呢？同是塔斯社的報告，自一八九四年至一

九一六年的二十二年間僅用八種語文印行了一百另八萬三千冊。據這些數目看來，我們可以判定：高爾基死後他的著作發行額，一年起碼須抵沙皇時代的十年。

這不已經是一個很具體的有力的證明嗎？高爾基生前事業的「革命特徵」，不是確確實實與年俱進地在「強度化」嗎？

有了高爾基這樣死了而永遠活着的人，令我們對比地不得不聯想到有很多活着而已經永遠死去的人。特別在高爾基逝世五週年的今天，我們的一位出賣民族利益的大漢奸汪精衛正親身在倭寇宮庭裏朝覲。

就把秦檜、張邦昌、石敬瑭通同加集攆來都還趕不上他的無恥的這位空前的賣國賊，不用說他依然是活着的，今晚確確實實地他還在倭寇的皇宮裏就寢，在他和他的嘍囉們或許還受寵若驚，然而事實上他和他們是已經死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死。

汪精衛在前也是一位頗有聲譽的文人，記得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還在廣州的

時候，廣州市的一家照相館是把他作爲「中國的大文豪」列爲革命偉人十傑之一的。他的舊式詩詞，至今還有一些人迷戀惋惜，說是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但是民族的正義感是最嚴烈的裁判人，我在兩年前想找他的言論集來，做一篇指斥他的文章，却至今連一本也沒有找着。

民衆是最公正最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的是非美惡的判斷比任何客觀的尺度還要準確。汪精衛的面孔在中國人中本來要算漂亮的，然而被近來的漫畫家和雕塑家刻畫成哭喪的形相，有的還要在頭上給它加上一頂平頂朝天冠。任何人看了都覺得它是真實。昨晚在抗建堂的跳舞會上有吳曉邦的丑表功，便是戴着這樣一種哭喪面的新式舞蹈，博得全場的人鼓掌喝彩。汪精衛的哭喪臉成爲我們中國最醜惡的典型了。

高爾基的面貌，說來有點失敬，在俄國人中似乎也並不怎樣美好。據有名的士敏士的作者格拉特珂夫的第一次會見高爾基所寫出的印象是：「蒼白的臉剪短

的頭髮……鴨鼻，瞳仁——不大有精神，沒有光澤，修得不很整齊的鬚鬚……嚴肅的不會應酬的視線。」又說：「瞳仁陰沉沉的帶些憂鬱，而且有些潤溼，面孔不健康地蒼白，厚厚的唇蓋滿了鬚鬚。」這照實際上講來，怎麼也不能夠說是美好，然而格拉特珂夫已經說他的面孔「高貴」而且笑容是「溫和可親」。就是我們，雖然沒有機緣會見過高爾基，單是對着他的像片便自然的要發生一種崇敬的念頭。我敢於保證，我們中國的作家，差不多無例外地認為高爾基具有聖者的風格的。在蘇聯方面，高爾基的相貌是否已經成爲一種極崇高的典型，我還不會知道，不過我現刻聯想到另外一件事，便是德國的大詩人歌德，他的相貌，是曾經被德國的藝術家美化了來作爲太陽神阿坡羅的典型。

汪精衛成爲小丑，高爾基和歌德成爲神聖，這兒正透露了文學和藝術的秘密，也就是透露了新現實主義的秘密。藝術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並不必是一致的，然而藝術的真實，事實上比現實的真實有時還要真實。高爾基把這項秘密替我們

在幾句精粹的話中定式化了。他在有光輝的小論文藝術與工藝裏說道：

藝術的目的在於誇大好的東西，使它顯得更好；誇大有害於人類的壞東西，使人一見生厭，引起一種衝動，要把生活中被可憎亦復可憐的僵狹觀念所造成的卑鄙無恥的物象加以毀滅。藝術歷根兒便是一種擁護或反抗的鬥爭；中立的藝術並不存在，因為人並不是一個照相機，他並不是「固定」現實，而是把它加強、改變或毀壞。

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以往的真正的藝術家在無聲無臭之間實際上是依據了這種理法而來，今後的藝術家不用說更當理直氣壯地依據着這種理法而前進。

或者有人會說：這種見解和我們中國的「溫柔敦厚」的「詩教」不甚相容。記得在兩個月前同在抗建堂曾經表演過馬彥祥的話劇國賊汪精衛，原來的劇本是以汪精衛做夢化形為狗而結束了的，聽說便是以為有傷「溫柔敦厚」之教而被檢查官刪去了。以狗來斥責汪精衛的手法並不怎樣新奇，而且假如狗能夠說人話，牠是會依據別種理由對於作劇者抗議的。

實際上「溫柔敦厚」這個教條，也並不是真正的孔門教條，那是漢代的偽古文學家杜撰出來的東西。真正的孔門教條，却不是這樣，孔子對於詩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曾經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這大意，在我看來，是詩可藉以使人感覺興趣，可藉以觀察事理，可藉以因同好而團結羣衆，可藉以因共怒而怨恨仇讎。分明說出一個「怨」字，可見得並不是一味的「溫柔」。詩裏面也分明有「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的文句，對於惡人是痛恨澈骨，又何嘗是一味的「敦厚」？

中國儘有不少的好的教條，例如「以德報怨」、「除惡務盡」，或「彰善闡惡，樹之風聲」。却不甚爲人所注意，而偏偏是這「溫柔敦厚」的偽教條，在中國的文藝界和一般社會上，或無意或有意地，發揮着意外的威力。

「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我們中國人對於是非善惡的判別素來是敏感的，尤其在目前與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作了四年的殊死戰的現在，誰個還不

知道合乎民族解放的利益的便是善，反乎民族的解放利益的便是惡？善的我們固然要盡力的表揚，惡的也要毫不容情的盡量的誇張。我們深切地知道，姑息適所以養奸，縱容了惡人事實上是等於陷害了賢良。惡人的陰險毒辣，卑鄙醜惡，是毫無限度的。像高爾基那樣崇高的人，不是都有兇狠的叛徒們用科學的犯罪行為來把他毒死了嗎？

是的，「應該要不仁慈和毫無憐憫地針對着敵人，也不放鬆職業人道主義者們的悲哀和嘆息。」高爾基在基洛夫被暗殺的當時，已經就警告過我們了。

我們不會忘記他所給予我們的爭取光明的號召，然而也決不會忘記這針對敵人的警惕。——「敵人如果不投降，——便消滅他！」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

追慕高爾基

高爾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週年了。受着他的偉大的精神感召，我們年年今天都在紀念着他，這一方面固然是我們對於這位偉大的導師懷着無限的追慕，另一方面也應該是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來對於我們自己的檢閱，看我們把人民本位的思想、人民本位的文藝，究竟體驗到了怎樣的程度，實踐到了怎樣的程度。

十年前，高爾基在世的時候，莫洛托夫的追悼辭裏面有着這樣的話：「列寧以後，高爾基的死對於我們和全人類是最重大的損失。」這是一點也沒有過分的話。高爾基是列寧的親密的友人，而同時又是一位忠實的助手。他是始於人民，終於人民，始終以他的文藝的才能奉獻於人民，奉獻於革命的。列寧開創了人民的新世紀，高爾基開創了人民的新文藝，他們在成就的尺度上雖然有廣狹的不

同，他們的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俄國在列寧死後有了無數的列寧的學生，鞏固着人民本位的革命政權，使蘇聯成爲奠定世界和平的偉大的柱石。在高爾基死後，也有無數高爾基的繼承者，培植着人民本位的革命文藝，使蘇聯文藝呈現出百花爛漫的永遠的春天，就這樣，由於列寧和高爾基的死所遭受到的重大的損失，在蘇聯是已經得到補償了。

但是我們中國呢？列寧死後不久便有孫中山的去世，高爾基死後，僅僅四個月便有魯迅的去世，這在我們是重重的重大損失。這損失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它的補救。人民本位的思想一直在風雨飄搖，人民本位的文藝一直在彷徨歧路。我們今天的確是應該嚴格地批判自己，督勵自己的時候。

辛亥革命成功後的第二年，就是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中華民國元年，高爾基曾經寫過一封信給孫中山先生，那裏面有了這樣一句話：「我們俄國人也希望能夠達到你所達到的成就，我們在精神上是兄弟，在尺度上是同志，可是我國政府

和它的奴才們，卻要使俄國人民站到仇視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去。」這句話正表明着高爾基的超越了國界的偉大的愛憎，他超越了國界對於我們的革命表示無限的愛慕，而對於他本國的當時的支配者沙皇政府表示無限的憎恨。這兒正表現着人民代表的高爾基的本色，人民的利益是沒有國界的。可是高爾基的這句話在今天卻該我們來說了。

蘇聯的十月革命比辛亥革命遲了幾年，但他們的成功卻是真正的成功。孫中山先生已經替我們說過：「十月革命是全人類的救星，十月革命的成功爲人類生出了很大的希望。」的確的，這是自有歷史以來第一次的人民本位社會主義的革命，人類有權利自行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了。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立即解除了對於中國人民的仇視，而以博大的同志愛，兄弟愛，向我們伸出了手來。我們要問在二十幾年前對於我們首先自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放棄租界，放棄領事裁判權的是誰？不是蘇聯嗎？

我們的革命是受着重重的阻撓的。內部有封建軍閥的盤據，外部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一直不容易成功。在二十年前的北伐前後幫助我們建軍，幫助我們打倒軍閥的是誰？不是蘇聯嗎？

這一次的抗戰初期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對我們袖手旁觀，並且冷眼譏笑，單獨和我們締訂互不侵犯條約，費了不少的人力物力來幫助我們抗戰，最後在東北終於共同作戰，把日本帝國主義毀滅了的是誰？不是蘇聯嗎？

蘇聯對於我們真真是做到了「在精神上是兄弟，在尺度上是同志」的情分的，然而我們對於蘇聯的回敬是怎樣呢？北伐成功後，接着就來一個大規模的反蘇運動，一直反了差不多將近十年。現在抗戰勝利了，我們又在不斷地放出一些莫須有的謠言，策動着仇蘇運動的老戲。有的人又在那兒高呼：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了。應着國際的逆流，有的人躍躍欲試的很想做一個反蘇戰線上的急先鋒。雖然也有少數頭腦簡單的人一時受了蒙蔽，但我們敢於說：反蘇仇蘇決不是人民的意

志，也決不是孫中山先生的意志。

人民的心裏是雪亮的，究竟誰個是真正的人民的朋友，誰個是口蜜腹劍的偽善者，人民的心裏是雪亮的。我們並不願意仇視任何國度的人民，但也不願受任何國度的統治階級的奴役。人民是不可輕侮的，沙皇的暴政不是早被蘇聯人民推倒了嗎？希特勒統治世界的狂夢不是老早化爲烏有了嗎？誰願意和人民對敵的人，不管他有怎樣大的武力，遲早會步着沙皇和希特勒的後塵。爲了使人類減少一次大流血的慘痛，我們誠懇的希望那些懷着妄想的人們早早覺醒，用兄弟愛和同志愛來解決一切的糾紛。

高爾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週年了。我們今天應該檢閱我們自己。我們應該堅定我們的對於人民力量的信仰，用我們中國人民的有力的溫暖的手，和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緊緊地握着。我們要反對任何變相的法西斯蒂的暴政，我們要抵抗任何變相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要組織國際的人民陣線，制止戰爭，鞏

固世界的和平。這些是今天的民主政治的使命，也是今天的人民文藝的使命。

高爾基精神不死！

人民本位的民主思想萬歲！

人民本位的人民文藝萬歲！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

契珂夫在東方

契珂夫在東方很受人愛好。他的作品無論在日本或中國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譯了，他的讀者並不少於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風很合乎東方人的口胃。東方人於文學喜歡抒情的東西，喜歡沉潛而有內涵的東西，但要不要傷於凝重。那感覺要像玉石般玲瓏溫潤而不像玻璃，要像綠茶般於清甜中帶些澀味，而不像咖啡加糖加牛乳。音樂的美也喜歡這種澀味，一切都要有沉潛的美而不向外表的華麗。喜歡灰青，喜歡憂鬱，不是那麼過於宏偉。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別在這方面投合了東方人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他的東方成分是多過於西方的。他雖然不做詩，但他確實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是詩，他的戲曲也是

詩。他比屠格涅夫更爲內在的，而比托爾斯泰或安斯基更有風味。

在中國雖然一向不十分爲人注意，他對於中國新文藝所給予的影響確是特別的大。關於這層，我們只消舉出我們中國的一位大作家魯迅來和他對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珂夫的極相類似，徑直可以說是孿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他們都是平庸的靈魂的寫實主義。庸人的類似宿命的無聊生活使他們感覺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類儼然是不可救藥的。

他們都是研究過近代醫藥的人，醫學家的平靜鎮定了他們的憤怒，解剖刀和顯微鏡的運用訓練了他們對於病態與癥結作耐心的無情的剖檢。他們的剖檢是一樣犀利而仔細，而又蘊含着一種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們却同樣是只開病歷而不

處藥方的醫師。

這大約是由於環境與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兩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結核症而倒下去了，單只這一點也都值得我們起着同情的聯想。這種病症的自覺對於患者的心情是可能發生一種同性質的觀感的。內在的無可如何儘可能投射為世界的不可救藥。就這樣內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織成爲慘淡的、虛偽的、含淚而苦笑の詩。

但兩人都相信着「進步」，這是近代生物學所證實了的、無可否認的鐵的事實。故雖失望，而未至絕望。在刻骨的悲悵中未忘却一絲的希望。

契珂夫時時繫念着「三二百年後」的人類社會光明的遠景，他相信「再過三二百年後，全世界都要變成美麗而可愛的花園。」（庫普林：契珂夫的回憶）「經過三二百年之後，世界上的生活都要變成十分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三姊妹中韋士英所說）這希望給契珂夫的作品以潛在的溫暖，就像儘管是嚴寒的冰

天雪地，而不是無生命的月球裏的死滅。

魯迅的作品也正是這樣。但魯迅比契珂夫佔了便宜的是遲來世界二十年，後離世界三十年[●]以上。魯迅以親眼看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國革命勢力的聯帶着高漲，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後」，竟在契珂夫去世後僅僅三二十年間便到來了。

在這兒魯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爲了現實，明天變成了今天。「進步的信仰」轉化爲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像樣一點吧！」——在契珂夫所「不能高聲地公然向人說出」的，而在後期的魯迅却「能高聲地向人說出」了。魯迅是由契珂夫變爲了高爾基。

但是毫無疑問，魯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響的。

● 契珂夫 (1860—1904)、魯迅 (1881—1936)。

因而前期魯迅在中國新文藝上所留下的成績，我是這樣感覺着，也就是契珂夫在東方播下的種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作於重慶，爲紀念契珂夫逝世四十週年

悼念 A·托爾斯泰

「A·托爾斯泰是蘇聯最卓越，最有聲望的作家之一。」莫洛托夫先生在一九三六年第八次蘇維埃非常大會的報告書中，這樣向全世界宣告過。托爾斯泰對於這樣的稱譽是受之無愧的，無寧倒可以更把範圍擴大這樣說：「A·托爾斯泰是全世界最卓越，最有聲望的作家之一。」

托爾斯泰的將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活中所產生的作品是異常豐富的，創作範圍也異常的廣闊。他差不多什麼題材都寫，什麼形式的作品都寫。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寫政治性的論文，寫兒童讀物，寫電影劇本。就是小說，他也不論是長篇、中篇、短篇，一律都寫，寫得多，而且寫得好。這的確是驚人的一個現象。據說羅曼羅蘭曾經寫過信給托爾斯泰，表示過這樣的讚嘆：

我讚嘆你的創作力的無窮盡的豐富。……使我們特別驚異的是你的藝術堅牢而真實地，善於在圍繞的環境裏塑造着人物。你的人物成爲空氣、土壤、日光，自己時代圈子裏的不可分的部分。

這樣的確可以算得是超級的讚辭，羅曼羅蘭確實是把我們大家所懷抱着的對於托爾斯泰的驚異，表達盡緻了。

但托爾斯泰何以做到這樣的成就呢？假使我們輕率一點，簡單的一個字便可以回答，那便是「天才」。無疑托爾斯泰確實是一位天才型的人物，但他是採取了怎樣的路徑，或依靠着怎樣的條件，才完成了他的「天才」，倒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在我看來，他在主觀努力的方面，有最顯著的三個要素：第一就是他不斷的努力，第二就是他不斷的改正自己的錯誤，第三就是他對於民間語言和藝術知道十分尊重。

他在創作上的努力是驚人的。他自己說過：他寫大作在苦難裏行進三部曲，前後費了二十二年。他寫彼得大帝，更把所有的歷史檔案和機要局的「口供」都是研究過的。

他不斷的改正自己的錯誤，而且用全付力量去改正。他自己說過：他在年青時代受了象徵派的感染，到後來他知道這是反動的傾向，他就盡力改正過來，回到現實主義的路上。他說：「我愛人生，我本着全付的心力反對抽象，反對唯心論的人生觀。」在十月革命的初期，他對於十月革命也是不能接受的，但他自己說：「我後來慢慢地成熟了，慢慢地加入了現代生活，但一經加入，我就用一切感覺接受了它。」這種勇於改過，而且用全付力量從事的精神，應該是托氏成功的最大秘訣。

他最愛蘇聯民間的語言、民間的成語、歌謠、創作。他曾經主編過一部很厚的蘇聯各民族的民間成語集，據蘇聯作家K·鮑斯妥夫斯基(K. Paustovsky)說：

「這部作品，除文學價值之外，富有純科學的意義。」就是這樣地不斷的從民間的一切汲取創作的源泉，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保持着那樣新鮮、健康、平明、民主風度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到了解的。

有了這些主觀的條件，托爾斯泰之所以有那樣驚人的創作力，那樣豐富而多樣的表現，決不是不能理解的事。但我們在強調這些主觀條件之餘，我們應該也不要忘記還有同等重要的客觀條件的存在，那就是蘇聯文藝政策的賢明，以及文藝工作者在蘇聯特別被重視。

我們要知道托爾斯泰先生並非共產黨員，但他在蘇聯的聲望和地位，比黨員作家們來得更要隆重。這兒可以揭舉一些事實來證明：

一九三七年，托氏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一九三八年，獲得列寧獎章。

一九三九年一月，被選為蘇聯最高文化機關——科學院的會員。

一九三九年，獲得榮譽獎章。

一九四一年，彼得大帝獲得斯大林一等文藝獎金。

一九四二年，三部曲在苦難裏行進獲得斯大林一等文藝獎金。

一九四四年，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內成立文藝委員會，計包含蘇聯作家一百多人，托氏被任爲主任委員。

據這些事實看來，可見蘇聯的文藝工作者是怎樣得到了蘇聯政府的保護和重視。不管你是黨員或非黨員，只要你有成績表現，你對於國家和人民有切實的貢獻，政府是一律重視你，保護你，而且對於非黨員似乎還特別加意保護。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報告的是托爾斯泰有自家用的汽車和隨時可搭乘的飛機。這是蘇聯大使館的秘書費德林博士告訴我的。他兩年前回國述職，曾經兩次去訪問托爾斯泰，都不在家：因爲駕起飛機往前線去了。像這樣自由自在的忽然飛到前線，忽然飛向後方，在我們中國作家看來，實在不勝羨慕。

我們中國人對於文藝創作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文人一定要窮，然後文章才做得好。所謂「詩以窮而後工」，差不多成爲天經地義。因此，假使一個文藝工作者還不夠窮，大家一定還要湊成他一下，把他率性打到一十八層的地獄底下，那樣好像更夠格了。

我們也時常聽見人說：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這原因，我似乎可以簡單的回答一句，便是中國作家窮得太可憐。我在這兒並不是想借故發牢騷，事實上的確是值得考慮的嚴重的問題。

我懇切地希望，我們作家方面自然要向托爾斯泰學習，學習努力充實自己，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不斷地由人民的一切汲取創作的源泉。但我們也迫切地呼籲，希望我們主持文藝或文化運動的當事人，不妨採仿一下蘇聯的賢明的文藝政策。

靠着內在和外條件的相輔相成，我們希望在新文化的建設上更能有所表

現，在中蘇兩國的文化交流上更能有所促進。

盡我們全付心力，根絕法西斯思想！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向普希金看齊

今天二月十日我們來舉行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年祭，這個日子在我是有雙重意義的紀念日。去年的二月十日我們在重慶較場口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到今天也恰恰一週年了。同時捱打，而且打得頭破血流的李公樸，已經為民主運動而犧牲了。今天我們在這兒紀念普希金，我怎麼也不能忘記我們的民主戰士李公樸。假使他今天還在的話，他可能是在今天的大會場上做總指揮的，然而他已經離開我們半年多了。

李公樸是卓越的社會教育家、民主運動的戰士，是誰也知道的。但李公樸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卓越的歌者，他也是喜歡普希金的一個人。在較場口事件後他有一次曾經向我說：「我們中國的詩人，文藝工作者，應該向普希金看

齊！』今天這句話要算是我們的寶貴的遺訓了。

一點也不錯，我們應該向普希金看齊！不僅在作爲詩人、作爲文藝工作者、在寫作詩文上應該向普希金看齊；就在做人上、在立身處世上，我們尤其是應該向普希金看齊。普希金和我們相隔雖然已經一百多年了，但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普希金的時代很相彷彿。他所走過的路，他在文藝上和人格上的光輝的成就，的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作爲詩人，作爲文藝作家，普希金是俄羅斯新文學的開山，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於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同這些光輝的名字一樣，他也不單僅是俄國的大詩人，而是超越了國境了。

他的成就是很宏大而且廣泛的，他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寫歷史研究，在各方面的成績不僅多而且精。他是有名的博學多能的作者。他的寫作的態度非常謹嚴，手稿要經過四五次的修改，一點也不肯苟且。但他一經寫定之後，就是沙

皇的命令要叫他改變，他也是不能聽從的。他的作品風格是異常地清新俊逸的，有莫扎特的小曲中的愉快的跳躍，拉斐羅的繪畫中的生動的氣韻，這些當然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這些並不是專靠他的天才得來，而是主要地靠着他做人的努力上得來的。

他的做人的態度，在我認為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學習：第一是他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第二是他的爲革命服務的志趣；第三是在這兩種生活原則之下，他發揮盡致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氣概。

普希金雖然是貴族出身，但他的生活態度首先就是反對貴族的。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場，以文藝的武器來誠心誠意地替人民服務。他採用着人民的言語，利用着民間的傳說，歷史上於人民翻身有關的故事，作爲他的創作工具和材料，以促進人民的解放。所以在普希金的創作中，他是把俄羅斯的人民意識，俄羅斯的言語，俄羅斯的歷史，整個復活了。盧那卡爾斯基說過這樣的話：

「在貴族普希金的心中，覺醒了的並不是貴族階級。而是人民、國家、語言、歷史的必然性。」這是對普希金的最正確的認識，也是普希金的本質。我們要了解這人民的普希金。這種人民本位的精神是最先值得我們學習的。

普希金當然並不是職業的革命家，但他在俄國革命的推動上，在解放農奴、推倒沙皇政權的近代俄國的產生上，他本人和他的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根據他那為人民服務的立場，當然是革命的朋友，是為革命事業而服務的。他以其那叛逆思想被沙皇政府監視，過流放生活，遭受種種的迫害，然而他始終是站在革命隊伍的一邊。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值得我們敘述：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曾經有過一次十二月黨人的叛變。黨人們鼓動起士兵們在上議院的廣場反對新接位的尼古拉一世，要他退位。尼古拉一世用武力把這件事鎮壓下去了。領導者五人受了絞刑，一百二十多個人充軍到西伯利亞。那時候普希金正被軟禁在他的故鄉米海洛斯訶耶，受着看管。但到第二年

的九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很想施點仁惠來籠絡人民，他命人從米海洛斯訶耶就像遞解囚犯一樣，把普希金星夜兼程地送到彼得堡。沙皇寬大地接待着他，宣說已經把他赦免了。那時沙皇問他：「假如去年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你是不是會參加十二月事件？」普希金回答得很直率，他說：「陛下，無疑，我是一定會參加的，因為在造反的陣營裏都是我的朋友。」這樣的一個插話，不正表示着普希金的革命精神嗎？普希金的這種革命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而同時在這個插話裏我們倒感覺着一些驚奇，普希金那樣的回答，尼古拉一世倒沒有說立刻把他關起來，這位沙皇的寬大倒是值得我們羨慕的了。

普希金雖然是貴族，但他的家況是很式微的。特別在他結了婚以後，他的夫人娜達麗亞是一位交際花，只顧她自己在社交場的出入，而不管普希金的死活。普希金就爲了他的太太措了一身債，靠着寫作來償還。他有時是被逼得走頭無路的，然而他不曾爲了貧賤而改變節操。

他的夫人娜達麗亞是一位美人，尼古拉一世也喜歡她。爲了得以時常和她親近，得以讓她在宮庭裏參加舞會，他賞賜了普希金一個小小的官職，便是侍從小官。這假如是落在一些攀龍附鳳的卑鄙文人手裏，就是做了一名小小的「卒子」，都是要感覺着受寵若驚的。然而在普希金，把這件事看成了莫大的恥辱。所謂「富貴不能淫」，他確實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

他在彼得堡的生活是受着沙皇和憲兵隊長本根多爾夫的雙重監視，連寫作和發表也沒有絲毫的自由。普希金有名的歷史悲劇波里士·戈都諾夫打算要出版，要送呈尼古拉一世親自審查。那位真是名實相符的「傻皇」，竟把別人的悲劇誤解成喜劇，而下出一條手諭，要普希金仿照斯柯特的作風改變成歷史小說或故事，普希金坦然地拒絕了。他說：「我並不想改變自己所已經寫成的東西，不能不表示遺憾。」這應該是「威武不能屈」的一個很好的證據吧？

這樣有叛逆思想的人，在沙皇政治之下，當然不會容許安然存在的。借刀殺

人的陰謀便在縱容、掩飾，甚至暗中鼓勵之下發生了。法國的一位保皇黨，名叫丹特斯，逃亡到俄國。沙皇任命他爲騎兵近衛隊的一個軍官。這丹特斯同時又被荷蘭公使額克倫收爲義子。丹特斯和普希金夫人發生了戀愛。額克倫竟寫匿名信去嘲笑普希金。因此便把普希金激怒了，終於向丹特斯投出了手套，而遭了丹特斯殺人犯的卑鄙的槍殺。

這事情照我們東方的觀點上看來，或許會嫌普希金過於輕率吧？但這也正是普希金的精神。普希金他自己知道，他是俄羅斯人民的代表，是俄羅斯文化的代表，他的受了侮辱也就是俄羅斯人民受了侮辱，俄羅斯文化受了侮辱，故爾他不僅把自己的血和生命來做抵押，要把俄羅斯人民、俄羅斯文化的名譽爭取回來。他雖然受了卑鄙的暗殺，死了。但他真是死了嗎？死了的是普希金的身體，永遠活着的是由普希金所代表着的俄羅斯人民、俄羅斯文化、俄羅斯精神。

由於普希金的死，俄羅斯人民的確是從幾年的睡眠當中醒來了。無數的青年

學生、工人、農人、小市民，都關切着普希金的受傷，而悲痛着他的死。參加了他葬儀的，一共有三四萬人。這是俄羅斯人民所第一次表示的集體行動，這行動却把沙皇震驚了。他起先本來是沒有把事件重視，丹特斯已經被宣告無罪，然而看到了這羣衆的威力，衆怒難犯，被逼得不能不把丹特斯免職而驅逐出境。荷蘭公使也被他本國政府撤職召回了。就這樣，我們請看，普希金是死了嗎？普希金是永遠沒有死的。

我們今天來紀念普希金，就要認識他這些精神。這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爲革命服務的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了這些精神，所以才能有普希金的在文藝上的成就。只要有了這些精神，就是從事於文藝以外的其他任何工作，我們都可以保證是可以產生出無數的普希金來的。

我們今天要向普希金看齊，站定人民本位的立場，爲人民解放、民主實現而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

步。假如有丹特斯、額克倫那樣的外國流氓，要侮辱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人民的姊妹，我們要不惜以血和生命作榮譽的保證。

普希金精神不死！

人民解放萬歲！

民主成功萬歲！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序「不朽的人民」

不朽的人民，它的英譯本在重慶的朋友們當中恐怕要以我的接近爲最早吧？因爲我得到的本子，是蘇聯對外文化局用飛機之便託人帶來的。我自己有心重譯它，因爲手頭有些研究的工作沒有可能分手，便停頓了下來。後來我把本子借給朱海觀兄看，並慫恿他重譯，他在公餘之暇，費了將近半年的功夫，終竟把這項工作完成了。海觀兄自己應該感覺愉快，就連我也感覺着十分愉快。

本書是這次蘇聯戰爭中的優秀的成品，在蘇聯本國很受歡迎的。雖然不是什麼大部頭的巨製，但它把蘇聯精神和真理必勝的原因充分的形象化了。這是真正的民主主義，人民本位文化的塑像。雖然所處理的只是戰役的初期，只是極龐大的戰爭機構的一極小部分，但見一枝一葉的真實描寫，我們儘可以推想得出參天

大木的全體。

人民是不朽的！解除了鐐銬的人民的力量是無限量的。對於人類理智與自由勞動的敬愛，加緊了骨肉的情誼，使蘇聯一百七十多種民族化成了一種堅韌無比的合金鋼。它不但抵擋着了有史以來最反動的法西斯獸軍的侵略，而且還要摧毀它，絕滅它，把人類解放的福音傳遍全歐洲全世界。

人民是不朽的！誰得到人民力量的便會勝利，誰失掉人民力量的便會失敗。這本來是古今中外的鐵則，由這次的蘇德戰爭，更擴大而言之，即民主同盟國對軸心國之戰，是以空前宏大的規模替我們更一一證實了。無疑，這實例表現得最明晰、最本質的地是在蘇聯戰場，原因是不僅那兒的戰爭猛烈，而且戰爭機構的動力也對立得最尖銳。那兒真是兩種極端相反的精神的白刃戰。我們固應該感謝蘇聯，爲我們創出了極有光輝的示範；我們也不應該自餒，要知道這同樣的範例，我們也可以創造得出。我們也是對於人類理智和自由、勞動知道敬愛的人

民，祇要我們兩手能更自由一些，大家能夠握得更緊一點，來操縱武器。

人民是不朽的！儘你是怎樣蠻橫的暴力在這力量前必定要遭摧毀。但僅談一陣精神勝物質是不夠的，赤手空拳究竟抵不住飛機大炮。要打倒敵人，不僅精神士氣要強過敵人，就是作戰的技巧和工具也須得強過敵人。敵人的力量不能低估，自己的缺點不能忌諱，對於敵人的優點必須儘量學習，以改正自己，補充自己。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千古不磨的金言。我們要知道蘇聯紅軍之所以獲得前史未有的輝煌勝利，不僅在於精神思想堅毅正確，而且在於這堅毅正確的精神思想得到優秀的戰術與武裝。戰前的準備可無庸再提，戰爭期中的不斷改進尤其是足以驚人的。即請閱讀本書吧！

本書的作者決不是專門高調精神勝利的唯心論者，他了解戰爭，了解敵人，而且更了解自己。他不怕家醜外揚，他有胆量暴露自己的弱點，因而喚起大家用全力來改正這個弱點。他也並不怕增長敵人的志氣，蒙在鼓裏，專頌光明，而前

途無限光明却全面地展陳在我們的面前。這種本領和自由實在值得人們羨慕與學習。這種本領固然屬於作家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有一個能使作家本領發揮盡緻的環境。蘇聯不僅在戰爭的策略上有着正確的領導，就在文藝政策上也是十二分的正確，由本書的產生也就很明瞭了。本書的作者如不是生在蘇聯，他的才能怕很難得到這樣廣泛的自由發揮吧。

諱疾忌醫是最危險的慢性自殺，這比敵人的猛攻還來得更猛。這只使醫師束手而使病菌跳樑。但人們的拜物神教性的子遺，竟往往使疾病、醜惡、一切不正當的東西都被圖騰化了起來。實在是最不合理的，最可憫惜的事。蘇聯的保護健全的新現實主義的文藝政策不用說是從這種迷惘完全解放了，因而蘇聯作家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和保障。和本書同樣，讓我們聯想到的是考納楚克的劇本前線，聽說因為暴露了內戰時期的舊軍人的弱點，在莫斯科上演時竟有軍人在當場表示過反對，但因人民的擁護，政策的支持，不僅作品在軍政上有所貢獻，而作者本人

更榮膺烏克蘭外交部長的顯職。

文藝是相當奢侈的東西，沒有充分的陽光和水露不容易開花；而它也是相當脆弱的東西，沒有充分的護育和支柱，開了花也容易摧殘。然而人民是不朽的，以人民利益為本位的文藝，必然得到人民的保護和愛惜，它也永遠會是不朽的。

關於本書的作者瓦西里·葛羅斯曼（*Vassili Grossman*）可惜我們所知道的還很少。一九四三年正月份的國際文學（英文版）曾經有本書的摘譯登出，在前頭附有一節歐更尼亞·克尼彼維奇（*Eugenia Knipovich*）的介紹，但所介紹的僅是作品，而沒有提到作者的生活和經驗。我為寫這篇序文時，也特別請教過在重慶的蘇聯朋友，但他們也還須得調查。大約作者還是一位新起未久的作家吧？關於他的詳細報導只好期諸將來了。

我們祝福他並期待他有更偉大的作品出現。

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

「亞洲蘇聯」序

朱海觀兄把美國戴維斯和施特格所著的亞洲蘇聯翻譯了出來，這是最適時宜的一件事。我們和蘇聯無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都是有密切關係的隣邦，然而我們一般的人所有的關於蘇聯的認識實在貧弱得可憐。儘管蘇聯是已經完成了揭開人類新史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她曾首先自動廢除了帝俄時代和我們締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了各種特權，歸還了所有的租借地，幫助我們完成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抗日戰爭的初期以不小的人力物力援助我們，而在末期終於替我們解放了東北四省，然而對於她，我們卻沒有正常的認識。好些上了年紀的或頭腦單純的人把蘇聯看成和帝俄時代並沒有兩樣，因而也就有少數自私自利的頑固份子施其蒙蔽和煽惑的技倆，稱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或「新帝國主義」，而在最近竟發起

類似義和團式的排外行動，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急於糾正的大事。在今天有了這一部書的譯出，我相信是絕好的啓蒙，而且可以解救國家的危難，故我樂於盡介紹的義務。

本書中所述，像烏茲伯克斯坦，是我去年七月間親自去遊歷過的地方，那裏的開發和建設實在是足以驚人，大規模的工場和集體農場，設備完善的研究所，應有盡有的文化機構，差不多都達到了現時代的最高水準。而這只是在二十六七年間的成就。在革命以前，烏茲伯克是比我們的新疆還要落後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經叩問過我：爲什麼有這樣快？我看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表露。因爲一切的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都脫離了榨取或剝削的關係，而是以人民自體爲本位的。學術和生產配合，生產和人民生活配合，在這樣一貫的計劃與組織之下作有機的進行，當然會省卻了一切的周折。尤其值得注意的，烏茲伯克本是帝俄時代的殖民地，而她已完全脫離了殖民地的面貌。蘇聯是十六個民族共和國的聯盟，

烏茲伯克便是其中的一個，民族自治的原則，據我所親眼看到的是不折不扣地兌現了的。言語、風俗、信仰都保存着民族獨自的自由。烏茲伯克人就是蘇聯的一位主人，而不再是奴隸了。這兒沒有像英國對印度那樣的關係存在，建設的速度焉能不快？

舉一可以反三，我知道亞洲蘇聯的其他部分都會和烏茲伯克一樣。那些地方我雖然沒有去過，在本書中恰好把那全部的情形和盤托出了。從這兒可以給我們以幾個重要的認識：第一，亞洲蘇聯都是帝俄時代的殖民地，爲什麼都從殖民地的命運中解放了出來，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第二，蘇聯在四年的愛國戰爭中，雖然把歐洲蘇聯的大部分國土淪陷了，而終於獲得了輝煌勝利的原因是在哪裏？第三，這樣對待舊殖民地地的蘇聯制度是不是所謂「帝國主義」？第四，究竟是以什麼爲動機，使外蒙古終於脫掉了我們的羈絆而自行獨立了？這些問題，我們虛心坦懷地把這部書讀了便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蘇聯是日新月異的國家，人民力量的無盡藏，表現出來的便是建設上的突飛猛進。本書中所述可能大部分是已經屬於陳迹，然而總比我們仍然以對帝俄時代的觀感來對蘇聯的態度是大有距離的。要有明朗的認識然後才有正當的交際，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是要人做到知己的地步，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難道又不是這樣？爲了增進兩大民族之間的友誼，爲了減少由於不瞭解或誤會而生出的種種糾紛，爲了使自私自利的頑固份子們失掉蒙蔽和煽惑的活動餘地，我們都應該多多閱讀這樣的書。說得更誇大一點的話，閱讀這樣的書可以消滅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序「蘇德大戰史」

人們的健忘性是可以令人驚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相隔僅僅二十幾年，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發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隔還不到兩年，一些好戰的英雄們又在作第三次大戰的醞釀了。

第三次大戰將在誰與誰之間戰？

這已經是公認的預測，將在蘇聯與美國或英美之間，將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

有人相信，這是一種不能避免的宿命。但在我們看來，實際的形勢並不嚴重到那樣。

首先是人類已經進化到了今天，不再那麼愚蠢了。人民是決不歡迎戰爭的，不僅蘇聯的人不歡迎，就是英美及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歡迎。

人民非到自己的生存受到極嚴重的威脅，他們是決不輕易容許戰爭的狀態存在的。

今天，英美的人民受着蘇聯的嚴重威脅嗎？蘇聯的人民受着英美的嚴重威脅嗎？

在我們看來，這樣彼此間的威脅根本就不存在，還不用說到嚴重不嚴重。

蘇聯的建國原則，根本在於和平建設。她要使她社會化了的生產更加提高起來，讓人民享受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蘇聯根本是脫離了人剝削人的那種制度的國家。

人剝削人的對外發展，那就是找尋殖民地，就是侵略。對內雖是資本家剝削工農大眾，對外便是富有民族剝削落後民族。蘇聯根本沒有這樣的必要。

但她爲什麼要有那樣強大的軍隊？

那是保衛和平建設的武力。她一個單獨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在敵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爲了保障自己的建國原則，她不能不有那樣的武力。

那武力之所以強大，主要的原因就在它是保衛人民的利益，它是人民的武力。假使一旦這武力要用於侵略，那是違反人民的利益，它可以立地失掉人民的支持，而喪失它的強大。

蘇聯是決不會先發制人而從事侵略的戰爭的，這個我們可以斷言。她現在已經到了可以充分地自給自足的地步，無所仰求於英美。而英美呢？要想到蘇聯那樣的國家去殖民，當然也不好作那樣的夢想了。

威脅並不存在於英美與蘇聯之間，威脅倒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間，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彼此之間，存在於英美之間。

今天是美國資本主義登峯造極的時期，爲要保障她的資本主義的繁榮，或預

防週期的經濟恐慌的來襲，她不能不企圖獨佔世界市場。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也就不能不在全世界擴充軍事基地，並保持雄厚的軍事力量。

故在世界上還有可供開拓的殖民地，或可供蠶食的較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存在，美國尙無必要一定要和蘇聯作正面衝突。

今天美蘇之間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其實那只是好戰者所施放的煙幕。爲了要侵略別人的殖民地或干犯別人的主權，而藉口說「我要替你防盜」。

斯大林元帥最近答覆英國記者的話說得好：「應該把現在進行着的關於「新戰爭」的叫囂，和目下並不存在的「新戰爭」會實際發生的危險，加以嚴格的區別。」

美蘇之間的第三次大戰的叫囂是煙幕，那種戰爭在實際上發生的危險是並不存在的。

然而今天在世界上的確還有戰爭，那是資本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戰爭，即使

有的是採取着內戰的形式，但也掩不過它的本質。這主要是由英美所引起來的，與蘇聯無關。

蘇聯決不歡迎戰爭，但也不畏懼戰爭。世界如果得到明智的指導，循着不流血的途徑而達到理想的最高發展階段，蘇聯是一定歡迎的。但假如這條路一定要用別種的方式來走，她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她也堅決地相信她必然要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最後的勝利屬於人民，屬於以人民利益為利益的國度。人民的利益是超越了國界的。自來的歷史發展都在替我們證明着這個事實。最近的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替我們證明得鮮明。

當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挾其席捲了十六個國家的戰勝的威力，背信棄義，向蘇聯發動了閃擊戰，長驅直入，公然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門。

那時候同情蘇聯的人們，不是天天都在替蘇聯擔心？幸災樂禍的人們，不也

是每天清早都在等候着莫斯科陷落的消息嗎？然而莫斯科始終沒有陷落，而德寇終竟被打回去了。

在一九四二與四三年，德寇攻到了斯大林格勒時不也又激起了同樣的情緒嗎？斯大林格勒成爲了全世界的心臟，它的形勢的一張一弛，使全人類的脈搏一起一落。自然也有幸災樂禍的人們認爲斯大林格勒一定會陷落了。然而斯大林格勒始終沒有陷落，而德寇終竟被打回去了。

這記憶應該還是新鮮的吧？我們爲什麼那樣關心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這不純粹是由於對蘇聯的同情，而是關切着人類的運命，也就是各個人自己的運命。

蘇聯如果抵擋不住納粹德國，全人類便要受法西斯的奴役，整個的人類文化會被和盤推翻，希特勒的魔力真會把歷史發展的進向掉轉一個箭頭了。

然而蘇聯把德寇擋住了。蘇聯人民不僅從危殆中救起了自己的祖國，也從危殆中救起了整個的人類。請回憶一下吧：只要自己不是法西斯蒂，在蘇聯打了勝

戰的當時，我們大家不是都由衷地表示過慶賀嗎？

然而我們真是健忘得可觀。這些往事相隔還不過三兩年，而我們差不多完全忘在腦後了。我們受着一些好戰者的煙幕式的宣傳，把三兩年前對於蘇聯的讚揚，一變而為恐怖或忌憚。這實在是值得驚異的事。

爲了醫治我們的健忘症，我樂於推薦焦敏之先生的這部蘇德大戰史。我們請把往事溫習一下吧，看蘇聯在這次大戰中作了多大的貢獻。

最要緊的還應該看取蘇聯究竟是怎樣性質的國家，蘇聯在這次大戰中究竟是以什麼決定的因素獲得了勝利。

蘇聯的紅軍紅海軍乃至空軍，毫無疑問是無比的強大，但這強大的原因是從哪裏來？有良好的訓練，有精進的技術，有卓越的領導者，這些固然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原因是在於人民的解放，是在於人民成爲了真正的國家的主人。國家的

一切是人民的一切。因而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勝利也就是人民的勝利。這便是我們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王者之師，天下無敵。」

蘇聯是人民的國度。假使我們爲便宜起見，承認古代的「王道」這個名詞，這是與「霸道」敵對的以人民爲本位的政治或文化，那嗎蘇聯這樣實現了經濟民主，因而也就實現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國家，倒實實在在是奉行着「王道」的。只有在「王道」之下，全世界的人民才可以合流，全世界才可以進化到大同的境地。

但這是歷史的必然，「霸道」必然滅亡，「王道」必然勝利。
勝利永遠是屬於人民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讀了「俄羅斯問題」

一口氣讀完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真是愉快。

這的確是一個好劇本，一部有世界性的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無怪乎在蘇聯要受破紀錄的大歡迎了。

但聽說在美國方面被認是反美的宣傳文件，禁止演出。那倒正適合乎本劇所批判的美國今天的現實。不那樣，或許已經不是今天的美國了。

其實這何嘗是反美呢？在我看來，倒是百分之百的親美。不過所親的是林肯的美國，人民的美國，而不是八大財閥集團的美國罷了。

要說是宣傳吧，它只是說明了一點：蘇聯人民不要戰爭，而美國人民也不要戰爭。但我很知道，單只這一點，已經就是不能見容於今天的美國的。

一點也不錯，美國的麥克菲遜之流，他們「四分之一是蘇聯的敵人，四分之一是美國人民的敵人。」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斯密司既不能見容於今天的美國，俄羅斯問題當然也就不能上演於今天的美國舞台了。

但俄羅斯問題是不朽的，同樣，我也相信明天的美國，也就是純粹的林肯美國，一定是屬於斯密司。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

看了「侵略」

真是幸運得很，到香港來接連看了好幾部蘇聯的電影：豐功偉績、政府委員、丹孃、霓裳新舞，和李昂諾夫的名著侵略。這些影片不僅使我得到正常的娛樂，而且得到很豐富的教訓，除佩服、感謝之外，實在說不出什麼話來。假如一定要強分優劣的話，我感覺着侵略要算是最完整的一部，它的結構曲折繁富，而意義深永，耐人玩味。像豐功偉績和政府委員固然是莊嚴動人，但不免有些報導片的味道。丹孃是傳記體的東西，沒有什麼波折。霓裳新舞展開了很絢爛的歌舞場面，但故事卻很單純。這幾部片子，從開頭的幾個鏡頭，你就可以預想到它們的整個結局。這些也就是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的本道處，並不故意賣弄。侵略卻不然，它的主人公費多爾一出場就是一個謎，它始終鉤引着你，要等你看到快要

終場的時候，你才能豁然明白作者的用意。而且不到終場，你也難猜透費多爾的命運，究竟是死是活。他使你提心吊胆，他使你瞋目氣結，使你罵他，恨他，鄙夷他，但等到你自己明白了爲自己的淺見或性急所愚弄了的時候，你對他會油然而敬，而感到慰藉，待你最後知道了費多爾的命運，你竟會在一個神性的人民英烈之前低頭了。

費多爾是一位醫生的兒子，小時被放縱，受過良好的藝術教育，能彈一手的好鋼琴。他雖然生在好的家庭，好的環境裏面，却成了一個牢騷派、二流子，陷入於囹圄。德寇侵入蘇聯，才把他從牢獄中放出，他就因爲是被釋的牢犯，能在德寇的佔領區內自由出入。他回到了他的老家，也正是敵人侵略到的時候。鄉裏人都疏散了，黨委安德烈勸老醫生和他的一家也快疏散，而老醫生却願意留下，他的夫人和女兒奧麗也留下了。在敵寇佔領期間，英勇的地下工作者不斷的破壞，使敵人不得安息。敵人正加緊偵伺安德烈，想捕獲他，結果在一次極危險的情形

之下，爲衆所鄙棄的二流子却把安德烈打救了。槍殺了德寇的司令官，冒充着安德烈之名，而讓真的安德烈作了費多爾的頂替。援軍到後，城鎮雖被光復，而費多爾則在早一刻之前被處了絞刑。

費多爾這個典型實在令人感動。假使是一位共產黨員能夠見危授命，視死如歸，那是不足稀奇的。好在是一位二流子的出乎意外的轉變。但這轉變是不是真的出乎意外呢？不，在故事的進行中，儘管爲觀衆所不能預見，却絲毫不顯得有什麼不合理的突兀。因此也不顯得作家在故意賣弄，如像一般偵探小說或傳奇故事那樣。故事雖出乎意外而卻十分自然。

使費多爾突然轉變了的是什麼呢？是他的愛國心？是俄羅斯人的國民性？是費多爾的本性馴善，天良發現？不，作者不是這樣淺薄的唯心論者，他也不是立足在人道主義上的。這裏在我認爲是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教育問題。費多爾小時是被放縱了，他又生在國家承平建設的幾十年中，竟流於浪蕩。但在國難期

間，敵人有無數可恥可恨的暴行，親人有無數可歌可泣的忠悃，一一都呈現眼前，故在極短的期間，對於費多爾施行了再教育，而使他成了一個崇高的人物。這是說明在一個典型的教育環境之中，就是二流子也是可以改造。我們要的是良好的教育，那就要製造良好的環境，良好的示範，良好的制度。

當然，劇裏面也還有些壞東西，如像偽市長法尤兢，難道他又不可以改造嗎？但他是舊惡的積漸太深，並和獸性的敵寇共處，像費多爾所而接着的真實他就沒有面接到。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砂在泥不染自黑。」何況費多爾並未壞到蓬的地步，而法尤兢則本來就不是白砂呢！

五月十五日

出了籠的飛鳥

——看了「江湖奇俠」後

輕鬆，樸素，有趣，富有東方味道，在蘇聯影片中，怕要以江湖奇俠為第一號了。

這是蘇聯十六個聯盟共和國裏面的一個小國，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出品。這個國度在中央亞細亞，地理上和我們新疆毗鄰，歷史上和我們有過密切的關係，人種更是我們東方的黃色人種，這已經夠使我們感覺着親切了。但在我自己，在這些之外，還有一段更親切的回憶。那是在三年前我曾經過這個國度，到過這個國度的首都塔什干，並參觀過產生這部片子的攝影廠。因此我一看到這部片子，

這一段回憶，當然又會活鮮鮮地重現出來。

到了烏茲別克，我才切實感覺着蘇聯是民主自由的國家。看了烏茲別克的各種文化上的成就，我才切實感覺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

烏茲別克只是帝俄時代的一個殖民地。儘管在歷史上也產生過像鐵木耳那樣震動過全世界的偉大人物，但在它淪爲了殖民地之後，它的文化程度是非常低落的。低落的程度究竟怎樣，聯想到我們今天的新疆，我想大概就可以得到近似。

但是，十月革命以後一切的情形都改變了。整個蘇聯已經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在同盟國度或兄弟民族之間，更完全掃蕩了殖民帝國與殖民地的一絲一毫的氣息。因此像烏茲別克這樣落後的小國，僅僅三十年，一切的建設，便已經達到「世界的」的水準。這的確是一個奇蹟，比這江湖奇俠那斯列琴所施行的奇蹟，還要更加出奇的。

當然，從江湖奇俠這部片子當中並不能看出今天的新烏茲別克。尤其因為這是傳說性的歷史性的片子，它的野外鏡頭，自然只能挑選舊烏茲別克的一面來充任。因此，新烏茲別克的真相，從這部片子的表面上實在還看不出來。

但請朝深處看一下吧，或者看透那銀幕的背面。請看到那故事所含的意識形態，請看到那攝製者和演員們的技巧，請看到那整個藝術品的諧和、完整、飄逸。那些都是今天的烏茲別克人的精神成就。我們從這裏看不出奇蹟來嗎？

因此，我在這部江湖奇俠上不僅看見了傳說上的大俠那斯列琴的形象化，我更看出了現實的革命偉人列寧和斯大林的象徵。列寧和斯大林正是今天的烏茲別克人現實的那斯列琴了。

他們不僅把一個王子換成了一匹驢子，把一匹驢子換成了一個湖，而是把一個殖民地換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

烏茲別克人是快活極了，列寧和斯大林本人的樂趣是怎樣呢？

我也看得很清楚，他們也還是像銀幕上的那位那斯列琴，把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又換成一隻小鳥，更把它放還太空而已。

那自由自在的飛鳥，那無拘無束的飛鳥，那脫掉牢籠的飛鳥喲！

學習歌頌不完的偉績

——為紀念「十月革命」而作

無論何時都不要拒絕工作中間的細小事情，因為偉大事情是由細小事情構成的。

斯大林告訴我們：「這是伊里奇的重要遺訓之一。」

蘇聯之所以有這樣輝煌的今天，原因自然很多，但有這樣很好的兩代領袖，把這樣很好的科學精神普遍地實踐化了，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

歌頌是歌頌不完的，在我們最要緊的還是學習吧。學習別人的皮毛沒有用處，要學習人家的精神。

應該學習的東西自然很多，但像這「不要拒絕工作中間的細小事情」，怕是

最應該學習的吧。

我們中國人的辦法是和這相反的，是所謂「大而化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天大的事情等於沒有事，祇要把眼睛一閉，便萬事都美滿了。

人家建國二十七年已經在天上飛，我們建國三十三年還在地上爬，其所以然的原因自然也很多，積微與荒怠恐怕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愛許蕙願：「大願成就，替菩薩改換金身，重修廟宇。」但其實「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不要只期待明天明年，應該做的事情應該從今天今年做起。

中國古時候的人有時候也有一些好的教訓，譬如荀子說：「積微者速成。」「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此於小事者矣。」（強國篇）這似乎是和伊里奇的遺訓是一脈相通的。

看來外國有的好東西，的確中國未始沒有。然而僅這就足以使我們滿足了，我們有得來還要早一千多年咧。你看，我們中國多麼偉大！

然而人家天天在做，我們却整年整月整千年整兩千年的在等。兩千多年在封建意識的統制下老是不長進的，怕也就是由於這個原故吧。

不必再等了，學習人家，「無論何時都不要拒絕工作中間的細小事情，」把應該做的事情，把向菩薩許下的夙願從今天起一滴一滴的做起。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奉行國父遺教，向蘇聯看齊

——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十月革命」

二十七週年慶祝會上的演說辭

各位先生們！中蘇文化協會的會員們！青年朋友們！（鼓掌）

十月革命的成功，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告訴我們，為全人類生出了很大的希望。這在今天是最正確不過的評價了。（鼓掌）

在今天，蘇聯英勇的紅軍與紅海軍，蘇聯全體的人民，都把自己的全部奉獻給愛國戰爭，從東普魯士、從匈牙利、從挪威，從各方面，和英美聯軍相呼應，正把瘋狂的法西斯野獸，在它的巢穴中消滅着的時候，迎接着這第二十七次的十

月革命紀念日，這個日子是分外的輝煌燦爛的

蘇聯建國二十七年中所經歷的路，決不是玫瑰花舖就的路，而是荆棘縱橫的路。尤其是在建國的初期，她是在風雨飄搖中度過了她的艱難困苦的日子。在那時候，差不多全世界的國家都把蘇聯當成了敵人，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於十月革命作了崇高的評價，透視了蘇聯偉大的前途。他教訓我們要學習蘇聯要和蘇聯作最親密的朋友。這些寶貴的遺訓，差不多為全世界的國家所奉行着了。（大鼓掌）無論英國、美國、法國、南斯拉夫，這些原來的盟友，都競爭着要和蘇聯接近，和蘇聯更加接近。就是那昨天都還是敵人的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也改變了她們從前的錯誤，回過頭來和蘇聯攜手了。（長時鼓掌）

所以在今天，我們誰也不會忘記，蘇聯的建國者列寧先生的偉大。而我們中國人誰也不會忘記，我們的建國者孫中山的偉大。（大鼓掌）

在今天，學習蘇聯和蘇聯做最密切的朋友，依然是我們所應該加緊奉行的寶

貴遺教。(大鼓掌)

我們要學習蘇聯，我們要學習蘇聯的精神。學習那種「在工作中不拒絕細小事情」的精神，學習那種嚴厲執行自我批評的精神，學習那種巧妙地運用「多樣的統一」的精神。(大鼓掌)

斯大林先生告訴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要拒絕工作當中的細小事情，因為偉大的事情是由細小的事情所構成的。」他說：「這是列寧的遺教之一。」

我們知道列寧先生確實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他無論做實際工作或研究，他都非常精細、周到，決不肯苟且，決不肯敷衍，決不肯粗枝大葉；凡是有利的條件，就是一絲一忽，他都要把它據有起來的。斯大林先生也正是這種精神的繼承者。有名的一九四二年的五一手教，對於作戰中的紅軍、紅海軍、政工人員、知識分子、工人、農民，把他們所應盡的職務，指示得非常扼要。那裏面最使我銘

感的，是他說：「每一個射擊手，都要使自己成爲射擊的專家。」（鼓掌）這些精神，在蘇聯是透關地體驗着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愛國戰爭之所以能夠有今天這樣輝煌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事。

所以我們要學習蘇聯，我們就應該學習這種「在工作中不拒絕細小事情」的精神！（鼓掌）

蘇聯的執行自我批評，那嚴格的程度是世界有名的。在革命前，列寧先生對於孟塞維克的批判，對於考茨基派的批判，那嚴峻的程度是世界所周知的。革命以後，蘇聯對於托洛茨基派的清算，十年前的肅軍事件，那嚴峻的程度也是世界所周知的。這種嚴格的自我批判精神也很透澈地表現在文學方面，愛國戰爭以來的蘇聯文學，一般地表現着這種精神。對於自己的短處決不掩護，決不「諱疾忌醫」，總企圖能夠朝好處走，朝更好處走。舉例來說吧：

例如考納丘克先生的前綫那個劇本，那是得了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金

的。這考納丘克先生就是今天要放映的電影虹的原作者瓦西列夫斯卡雅女士的先生，他擔任過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副主席。他在劇本裏面對於紅軍的老牌將領便作了很嚴厲的批評。蘇聯大使館的費德林博士曾經告訴過我：他在莫斯科看這劇本演出的時候，觀衆中有些老牌的紅軍將領看得「惱羞成怒」中途退場。（鼓掌）足見像這種護短的人，在蘇聯方面也還是有的。但由於政府的賢明領導，社會正義的公正制裁，把這種人類精神中的弱點鎮壓下去了。（大鼓掌）不僅考納丘克先生獲得了崇高的榮譽，而且他的創作還促進了在戰爭的鐵火中的紅軍的改造。（長時鼓掌）

像這樣嚴厲的自我批判精神，在蘇聯國內任何方面都是透關的實踐着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愛國戰爭之所以有今天這樣輝煌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事。（鼓掌）

所以我們要學習蘇聯，我們就應該學習這種嚴烈地執行自我批判的精神！

(鼓掌)

蘇聯是善於運用「多樣的統一」這個原則的。我們大家都知道蘇聯是民族成分最複雜的國家，她一共有一百七十多種民族，有的言語文字不相通的程度，完全和外國一樣。這在一般人看來，統一事業無疑是最難的工作。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戈培爾之流也就是這樣估計的，他們認為祇消對蘇聯閃擊一下，不出三個月，蘇聯便會四分五裂。然而希特勒的算盤是完全打錯了。蘇德戰爭發動以來已經三年零五個月，蘇聯不僅還是同鐵鎚一樣堅固，而且把那騙人的什麼「純粹民族」的日耳曼人也快要打得四分五裂了。(大鼓掌)

蘇聯是怎樣做到這樣成功的地步的呢？在我看來，主要的就是由於巧妙地運用了「多樣的統一」這個原則。

有名的兩個口號，我相信誰都知道的，便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形式的表現。」這便是這個「多樣的統一」的應用。就像在一個母題之下，一切樂器

集中了起來，萬管齊鳴，構成了一個極和諧的樂曲。以人民爲主體，以人民的生
活幸福爲本位，在這樣的母題之下，讓各個人民自由地表現，自由地發展。這樣
使人民把國家的事看成大家的事，把大家的事看成自家的事。人民與國家，完全
打成了一片，這樣的國家是不可抵抗的。蘇聯之所以能夠有今天，愛國戰爭之所
以能夠有今天這樣輝煌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事。（鼓掌）

所以我們要學習蘇聯，我們就應該學習這種善於運用「多樣的統一」的精
神！（鼓掌）

這些精神：「在工作中不拒絕細小事情」，嚴格地執行自我批判，巧妙地運
用「多樣的統一」的原則，這就是科學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的精神。（大鼓掌）
我們要儘量地學習，尤其是我們文化工作者，如果學習了這些精神，我們對於自
己的國家，一定會有更多的貢獻的。（大鼓掌）

現在，我們中蘇英美四大國，是未來世界的聯邦，永遠和平的四大台柱。這

四大台柱要一樣的牢實，一樣的穩定，一樣的均衡；然後將來的和平殿堂才能夠牢實、穩定、均衡。假使這四個台柱裏面，有一根台柱不牢實、不穩定、不均衡，那麼將來的和平殿堂也就飄蕩不寧了。（大鼓掌）

我們今天和蘇聯、和英美共同分擔了解救人類的使命，這責任是多麼的重大！我們要完成這項使命，就應該向蘇聯的朋友看齊，（鼓掌）向英美的朋友看齊。（鼓掌）同時，我們要盡力地鞭策自己，加緊地奉行國父遺教，好好兒地把我們的國家建立起來，也要讓蘇聯的朋友，英美的朋友，向着我們——看齊！（長時鼓掌歷久不息）

此演說辭以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作於重慶青年館，事後追錄。

發表時復爲主編者加上會場反應情形，今剪報輯錄，一律仍舊。

蘇聯問題一二三事

一 斯大林的健康

近來盛傳斯大林病了，甚至有人說已經過世，只是沒有發喪。不管這些謠傳是出於惡意還是無心，足證世界上實在有不少的人在關心斯大林的健康。

據我所親歷的兩件事看來，我敢於說，斯大林的健康比三四十歲的人還要旺盛。

第一件是六月三十日的晚上，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歡宴科學院會員和各國代表，斯大林親自列席，從晚上六點鐘坐到十二點鐘，足足坐了六個鐘頭，絲毫也沒有倦容。

第二件是八月十二日莫斯科的體育節。這個每年必須舉行的全民族健康檢閱照例在紅場舉行。這一天天氣特別好，斯大林和蘇聯的其他領袖們站在列寧墓上檢閱，從上半十點鐘站到下午五點鐘，也足足的站了六個鐘頭。

這樣絕倫的精力是稍微衰歇了的人所能指望的嗎？

這樣的民主的風度似乎在別的國度裏面也是很少見到的吧？

二 蘇聯是不是民主？

幾天前，在一個下午，我在南岸連續講演過兩個地方，都有人問我：「蘇聯是不是民主？」懷着這個疑問的人似乎相當多。不僅中國如是，就在外國也似乎如是。

這要看「民主」的定義是怎樣。假使說一個國度裏面一切的人民都得到經濟上的平等，因而也保障了政治上的平等，要這樣才算是「民主」，那麼蘇聯正好

是民主國家，像英美便還不夠民主。

假使說像英美那樣的國家就是「民主」了，那兒的人雖然都有政治上的「平等」，而沒有經濟上的平等以為保障的，那麼蘇聯要算是超過了「民主」。

蘇聯是沒有私人企業和地主的國家，一切生產工具、土地、機器等，都為國家所有，也即為人民所有。整個的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構成家庭的各個成員，是「各盡其能，各取所值」的，人民是真正地在享受着「不虞匱乏的自由」了。

因而像生產過剩、勞動力過剩那樣恐慌現象，在蘇聯是沒有的。國家的生產準據着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可以無限度的提高，國家的生產也可以無限度的提高。一切生產是完全看準着需要。

事實勝於雄辯。今天戰爭是勝利了，像英美都在為復員與失業問題而頭痛，而蘇聯卻還要輸入意大利的工人二百萬以從事建設工作。事實在，無庸多言。

三 形同感電

蘇聯究竟有沒有領土的野心？這也是相當普遍的一個疑問。懷着這種疑問的人事實上就是說蘇聯有領土的野心就是了。但這只是不顧事實的猜疑。

蘇聯的領土已經夠大了，因為科學的進步，近年來又有許多類如奇蹟的種子的改良和土壤的改良，使半沙漠性的荒原，不毛的寒冷地帶都適宜於耕植了。西伯利亞已經有多年生的小麥，濱近寒帶的區域甚至於可以栽種檸檬了。蘇聯人民所關心的倒真真是：『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人家的眼光要遠大得多了。各種和自然鬥爭的內發工作正是他們的中心工作，而不是像別的強大國家一樣，岌岌不可終日地在開拓海外殖民地。

當然蘇聯也須得保衛她的領土，是毫無疑問的。蘇聯的那種制度存在，只要它是和人民生活有裨益的，和她接觸的人民，爲着自己生活的改進，或多或少總

要受着那種制度的影響，也是毫無疑問的。就如前二個世紀美國的共和政體一建立了，別的國家便相繼效法的一樣，形同感電，並不是誰在唆使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世界和平的柱石

今天的世界仍然在動盪當中迎接着蘇聯十月革命的第二十九屆紀念日，在我們個人是感覺着這個世界和平的柱石蘇聯，真好像中流砥柱一樣，絲毫不顯得動盪。

經過四年的愛國戰爭，蘇聯人民從法西斯瘟疫的大災難裏，保衛了自己的祖國，拯救了全人類，戰爭期中對於蘇聯的頌聲是從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裏都颺起着的。戰爭結束後才僅僅一年多，世界的瘡痕並未恢復，而對於蘇聯的誹謗卻又快要聚蚊成雷，淹沒一切了。這種反掌炎涼的態度，英國的大人物邱吉爾先生便是一個絕好的世界典型。昨天自己處在危境的時候，不惜一反生平反蘇的主張，屈尊求教，請蘇聯幫忙；今天危機渡過了，便又翻過臉來，把昨天的盟友當成宿

仇。這種站在自私自利立場的人，始終是自私自利的。在我們看來，他好像是反覆無常，而他自己卻終始一貫。戰爭前要反蘇是出於自私自利，戰爭中要親蘇也是出於自私自利，戰爭後又回到反蘇仍然是出於自私自利。

這種的自私自利，自然有一件輝煌的外衣，便是「人各爲其祖國」。邱吉爾先生們雖然顧不到那麼多的國際信義，然而從英國的立場上說來，他應該是公忠體國的一位老成政治家。這種相對的邏輯，我們自然是應該承認的。問題只是在那個「祖國」，究竟是什麼人的祖國。資本主義的國家，實質上只是少數資本家，特別是獨佔資本的權力機構，這已經是今天的常識，可無須乎多費筆墨的。邱吉爾先生們所謂的「祖國」就是代表少數大資本家利益的祖國，這利益當中是把邱吉爾先生的發言權包含着的。

邱吉爾先生們爲什麼那樣宿命的地仇視蘇聯，在這兒我們可以得到本質的了解了。那並不是單純的國與國對立的問題，而是人民利益與資本家利益對立的問

題。蘇聯是人民本位的國家，一切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機構都爲人民所共有，在那兒，資本家和地主形態的人物已經成爲了歷史的陳跡了。人民不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經濟上也一律平等，這正是世界上最實在、最澈底的一個民主國家。有的人不了解，以爲蘇聯只有經濟的民主，而無政治的民主，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無經濟的民主。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詭辭。請問：沒有經濟的民主何來政治的民主？沒有錢人的子弟連完全的教育都無法享受。能夠享受完全的政治上的權利嗎？又請問：既有經濟的民主，何以不會有政治的民主？或許有人說，那答案很簡單，蘇聯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主要的國政都是被操持在共產黨人的手裏，而且領袖幾乎是終身制，和極權國家的獨裁者看不出有什麼區別。這就是一般的人民沒有政治上的自由的確證。不錯，僅就形式上看來，的確會得出這樣不正確的結論，詭辯家們也正把邏輯的重點放在這些形式上，故爾能夠興波引浪，甚至誣稱蘇聯是極權國家。

要解除這種惘惑，事實上也並不困難。不錯，蘇聯是共產黨當權，但蘇聯的那個政黨並不同於英美的任何政黨，也不同於舊軸心國的法西斯黨團。蘇聯的共產黨，它就是蘇聯人民的精華，他們是最澈底地代表蘇聯人民利益的人，也就是最忠實地爲蘇聯人民服務的能幹的僕役。他們當政並不是坐在人民頭上去剝削人民，而是鞠躬盡瘁地替人民辦事。他們可以說是「能者多勞」，在平時要比一般的人民多受工作上的辛苦，在戰時是要率先做到成仁取義的模範。蘇聯的共產黨就是這樣的黨，那和其它國家的站在一定階層上的黨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形式上的蘇聯的一黨專政，而事實上也就是蘇聯的人民親政。蘇聯的領袖制也就在這同一意義下可以得到了解。領袖是人民中最能幹的人，因此他能獲得人民的長遠的信賴而使他長遠地爲人民服務。這倒接近於古代所說的「哲人政治」，和個人獨裁的極權政治是全不相符的。

總之，事實是最大的雄辯。理論難得糾纏，就請看事實吧：蘇聯是一百八十

九種不同的民族所構成的國家，有四十一種不同的宗教，這樣一種成份複雜的國家，革命以來二十九年，經過了多次的內憂外患和極其嚴酷的考驗，然而她團結得一天一天地比金剛石還要堅固。這假如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是怎麼也不能理會的事。理由很簡單，就是這個國家已經實行了真正的民主，民族有自治的自由，宗教有信仰的自由，一百八十九種民族是蘇聯的一百八十九種主人。更說得廣泛一點，一億九千三百萬人民也就是蘇聯的一億九千三百萬主人。他們之間，是沒有主奴上下之分的。要說有資本家，全體都是資本家，要說有地主，全體都是地主。因為工場和土地已為國家所有，也就是大家所共有。積極地推廣科學的智識，擴充理智的作用，而對於宗教信仰乃至一切兄弟民族的奇風異俗都聽其自然，讓它自生自滅。人民在這樣的國度裏面便如像在一個大家庭裏面一樣，人人都以國為家，所以生產起來盡力生產，戰爭起來拚命戰爭，才僅僅二十九年工夫便已經獲得了驚人的建國成績。這裏有像英國和印度那樣的關係嗎？沒有！有

印回衝突的那樣的現象嗎？沒有！有沒有經濟恐慌的徵候？沒有！有沒有工人失業、農村破產、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軍人跋扈、風俗侈靡的傾向？沒有！沒有！第三個還是沒有！這些都是事實，這些事實應該勝過邱吉爾先生們的雄辯。邱吉爾先生們就是不高興這些事實，害怕這些事實，而要盡力歪曲、隱蔽、或甚至抹殺這些事實的。爲什麼要不高興，要害怕？理由也很簡單，就是怕人民翻身，怕自己國度裏的人民感電。但是，枉然的，人民能夠永遠不翻身嗎？

今天世界上着急的就是邱吉爾先生之流的大人物。正是他們看見了大批的人民在全世界翻身，因而脚忙手亂地正在搶救他們所代表的大資本家、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時勢迫促，竟不惜倒行逆施。全世界便形成了一個戰後的大動盪。然而，是浪打岩頭，並不是岩頭打浪，人民本位的蘇聯事實上已經成爲了和平的柱石，是並不會動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呀，原子炸彈呀，取消否決權呀，擴充軍事基地呀，烏煙瘴氣，黑漆一團。這於蘇聯不僅是絲毫無損，在兩兩相形之下反而

見顯示出她的鞏固增燦。在今天我們應該加緊認識這個和平安定的力量的源泉。
這是出於人民，澈底相信人民的力量吧！努力肅清一切反人民的烏煙瘴氣！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駁胡適「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

胡適最近有一封給周鯁生的公開信，標題為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在各地的報紙上四處發表。他主要是駁斥周氏的歷史要重演嗎？那篇文章。我為慎重起見，想把周氏的文章找來看看，靠着朋友幫忙，好容易在貴州日報二月八日的星期論文上看見了，而在同一張日報的第三版也登載着胡適的那封公開信，毫無疑問，兩篇文章都是轉載的了。

周文裏面，在國際形勢中揭發了兩個事實：

(一) 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人士的心目中，今日關於對德對日和約問題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戰時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盛國。

(二) 國際上現在並沒有真正不能解決的爭端，也還沒有絕對勢不兩立的國家集團，我們並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

根據這兩個事實，特別是前一個，周氏十分擔心，認為是「很危險的傾向」，他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扶植戰敗的德國以抵制蘇聯的「歷史要重演」，因而他也提出了兩項對策：

(一) 在和平政策主張上應避免再開倒車，聯合國中列強應當一致貫徹戰時表白的消除侵略勢力之根本政策之精神，以訂立并執行對德對日和約。在和約規定之下，大家應當本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之大方針，切實管制兩國，不但全部解除他們的武裝（軍事的及地理的），並且澈底消滅他們的文化上或政治上及經濟上一切可以助長侵略勢力的因素。

(二) 即令今後世界上真有任何一個侵略國的話，正當的辦法只是由那些對維持和平特別有責任的聯合國的列強，運用聯合國全體的力量，保持集團安全，而不可以爲着要抵

制一個現存的侵略勢力，又來扶植培養另一個存在的（？）或許更危險的侵略勢力。

這些都本來是天公地道，七平八穩的敘述，而且敘述得非常娓娓客氣。在今天美國的世界政策很露骨地是扶植德日以抵制蘇聯，而周氏只把他說成「有些人士的心目中」的「傾向」。在周氏的立場，他自然是有幾分顧忌的，他是國家的官吏——武漢大學的校長，而且又是現任外交部長王世杰的親友，在今天澈底投向美國懷抱，並希圖引起美蘇戰爭以求拯救垂危政權的「國策」之下，要對於美國政策有所警議，並對於蘇聯稍示公道，那可以說是近於大逆不道的行爲。周氏在今天還能提出他那樣的主張，我倒佩服他具有幾分胆量。說話要那麼謹慎，自然是值得我們諒解的。然而他這謹慎，這顧忌，這娓娓客氣，卻被胡適抓着了。胡適就從這裏開刀，把他所揭發出的兩項提示都化而成為「問題」，便是說那些都不是事實，因而把他所提出的兩項對策，也就完全抹殺了。我們請來追究一下胡適的理論吧。

首先來看他的關於對德日政策的看法。

胡適抓着了「有些人士」的那種「傾向」，認為是「只不過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的幾個私人意見。」這樣輕輕的一手，也就把天下人的耳目都像掩蔽盡了。接着便斥責周氏「不應該太看重這種個人議論而忽視那些已經正式公表的方案與文件。」於是他便提出了「美國提出而英法熱心贊成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四十年協約草案」。他說：

這是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馬歇爾先生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兩次都被蘇聯打消了的。這個協約的主要目標正是要一種維持集體安全的武力來長期制止德國的侵略勢力的復活。當初美國政府曾表示，同樣的四十年協約可以適用到日本。這是美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在貝爾納斯先生提出之前，曾經美國參議院的兩黨領袖仔細研究過，將來當然可以得參議院的批准。

他就根據這一舉例，下了「三個判斷：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

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二、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三、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所以西方民主國家不能不考慮如何替他們保留一部分的工業生產力，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

我相信胡適寫到這些地方來的時候，他一定是很得意的，小鬍子在鼻下可能作過狐步舞，哼！你看，我這實證主義的法力！我的一個實證便把你周頌生和其他一竿子人反美袒蘇的論調肅清了。四強管制協約是美國提出來的，英法都熱心贊成，只有你蘇聯反對，這到底是誰在扶植德日呢？誰在扶植德日「以抵制其他戰勝的盟國」呢？西方民主國家是要「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但有一個「非西方民主國家」卻在反對。言內之意，言外之意，都把美國塑成爲了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蘇聯影射成一個魔鬼。這得意之筆的確是值得得意的。我不想否認：胡適是會做文章。他是主張「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人，既有證據

了，他要說話還不能理直氣壯嗎？我倒要看你怎麼能夠來駁得倒他？

然而胡適是在耍戲法，他那套實證主義是騙人的。我們現在只要把那「四十年協約草案」追究一下，他的全盤的騙局便破了。

那本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的國務卿貝爾納斯在巴黎四外長會議上正式提出的，最初提出時只是「管制德國二十五年計劃」，後來經過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修正才改為「四十年」的。且看那「管制德國二十五年計劃」的簡略的內容吧！那兒規定着應該廢止的有七項，可以准許的有兩項。

一、應該廢止者：

- (一) 所有德國武裝軍隊及半軍事性質之黨衛軍及祕密警察；
- (二) 參謀團或同樣的機構；
- (三) 軍事設備之生產、製造或輸入；
- (四) 海軍船艦及任何附屬物品，尤其包含潛艇等；

(五) 飛機及其任何裝備，包括高射砲等防禦物；

(六) 任何軍事基地、軍械庫、或防禦工事之維持；

(七) 戰時工廠、研究院、實驗室及新發明之特許權，計劃圖表等。

二、可以准許者：

(一) 配有輕武器之民事警察保留權；

(二) 建築、開礦、農墾及類似之和平經營所需要之小量炸藥之保存權。

我這所根據的是美國合衆社的電報，雖然不是全文，但我相信，胡適一定可以放心，這兒不會有什麼故意的歪曲或遺漏。這個提案到當年七月九日才開始討論，英法代表都會有些小的意見，但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修正意見最爲嚴整。他提出了八項修正意見：

(一) 對於防止德國的恢復軍國主義和重整軍備沒有充分保障；

(二) 二十五年爲期太短——至少應爲四十年；

(三) 在消滅德國軍國主義的意義上還比不上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

(四) 沒有規定消滅德國的戰爭工業；

(五) 沒有規定繼續消滅德國的納粹化；

(六) 缺乏防止德國重建軍國主義的政治基礎；

(七) 沒有包括關於繼續支持蘇聯賠償的建議；

(八) 把佔領期間縮短了。

我這所根據的也是美國合衆社的電報，請胡適檢閱一下當時的中外報紙，便可以得到實證。這是關於四強管制德國公約的論爭的第一回合，在這回合上沒有得到協議，但只由貝爾納斯接受了「四十年」的修正，把議案保留了下來。然而，在我們的「實證主義者」看來，便是這草案第一次「被蘇聯打消了的」，你說他真是在「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嗎？

接着是論爭的第二回合，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地點是莫斯科，人

物在美國方面換成了馬歇爾。這一次倒真真是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四十年協約草案了，但由馬歇爾所提出的『草案』和貝爾納斯所提出的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只是『插入了一項條款，規定該項公約，可以按期加以修正』。（據法國新聞社電，馬歇爾提案時的說明）當時莫洛托夫即提出修正案，『認為美國所提草案，有下列諸缺點』：

- （一）未曾提及肅清納粹；
- （二）未有四強管制魯爾之任何規定；
- （三）未有清理及移轉德國大企業之特別條文；
- （四）未有根據基本自由建立德國民主秩序之規定；
- （五）未有土地改革之規定；
- （六）結束盟國佔領之條件欠當。（據英國路透社電）

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把這修正意見和原案比較一下，看究竟哪個澈底一

點，哪個真正在替戰敗國的人民設想，在爲他們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設想。然而在討論議案的場合，馬歇爾却堅決拒絕莫洛托夫的任何修正意見，而迫着莫洛托夫對美國提案在「是」與「否」之間取決。

這樣的外交態度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大約這就是軍人外交的本色吧。除非是奴隸或附庸，我想任何人站在莫洛托夫的立場都不會接受馬元帥這樣的軍令的。當然議案也就在相持之間擱置下來了。這情形也就是胡適所說的第二次「被蘇聯打消了的」的實際。

你們請看，胡適這位「實證主義者」，他的所謂「實證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假使我們真是站在純正的公證人的立場來說話的話，這個被胡適所誇飾爲「美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實在是替美國人，替美國的歷史開了一次不小的玩笑。論道理，在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裏面，既規定了要「消滅納粹主義和

法西斯主義的最後痕跡』，要『解除德國全部武裝，使完全非軍事化』，照着那些規定切實管制下去，使德國人民真能享受民主生活爲止，同盟國便算盡了責任，何須乎還要來一個那樣『破天荒的政策』，只是在形式上列舉一些禁制，而把精神完全忽略了！提案既多此一舉，比雅爾達協定、波茨坦協定還要退步，自己雖然說『可以修正』，而又堅決不接受別人的修正，天地間有這樣蠻橫的外交嗎？要說『破天荒』，單只這一點也真可算是天字第一號的『破天荒』。其實這些『政策』的用意，在今天已經是很明瞭了，一句話歸總，便是存心和蘇聯不合作，要執行『巨棒』外交。文官的貝爾納斯態度還不夠強硬，所以才換成武將的馬歇爾。馬歇爾到了莫斯科，四外長會議剛開幕，我們不要忘記，便有杜魯門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公開反蘇的聲明發表。除非是傻瓜或幫兇，誰看不出美國當局的用意呢？是的，『武裝德日是英美法與澳洲加拿大諸國的人民絕對不肯允許的』，這倒用不着胡適來『武斷的說』，天地間又哪有那樣的傻瓜要來公開武裝德日呢？

公開是一套，暗裏是一套，好話說盡，壞事做完，這倒不僅是我們中國一部份人的拿手好戲呀！就爲了「人民絕對不肯允許」，所以必須粉飾，但那粉飾是不能認真的，一要認起真來，那就只好「拉倒」了。

戲法是怕戳穿的，戳穿了不僅胡適的公開信不值半文錢。「美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也不值半文錢。然而胡適還在那兒僞裝「天真」，虧了他說得出「至少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國家在他們管轄的地域之內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是的，這一點至少我也承認的。但我請他翻一翻他們「自由主義者」的大本營——大公報吧，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社論德國問題向後轉裏面就揭出了這樣的數字：「英區的二八四座軍需工廠僅拆了二十四家。」這說的是魯爾區，現在已同美國合併經營了。再請他讀讀大公報的主筆王芸生的日本半月吧，那兒開頭的一節裏面便有這樣的話：「橫須賀軍港還未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恙，神戶一個裝鋼廠是給海軍造船造砲的，規模之大像一個鋼鐵城，並未列入賠償拆遷之

列。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馳聘海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還存在着明的暗的組織。」大公報和大公報的王芸生，我相信是沒有吃盧布的，我想胡適也一定能夠相信。看到這些文字，對於自己的偽裝「天真」害不害臊呢？別的證據，像釋放戰犯、保庇一切舊勢力、強壓真正的人民活動、製造人爲饑饉，這些我們都可以不必多說了。不過胡適其實也並非那麼「天真」，他說話也是很有分寸的，譬如他說：「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譴責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政策改變，」「沒有」之上加「似乎」，「理由」之上加「充分」，那就是承認你也有理由。何況說「政策改變」，本是見仁見智的事情；譬如邱吉爾先生當英國危殆，他需要蘇聯來替死的時候，他可以說：「我改變了二十年來反蘇的態度，我從前錯了。」但等納粹德國打敗了，英國的危機過了，他又大喊起膺懲蘇聯的老調來。你說他是變了嗎？他何嘗變呢？此其所以爲「政策」，此其所以爲「策士」呀！但是要說「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

兩國來抵制蘇聯』，老兄，怕又未免說死了一點吧？把『決不要』改成『不至於』，是不是來得更活脫些？

是的，胡適的文章是做得煞費苦心的，我得承認；然而做來做去，在邏輯上卻合不攏來。他拿着兩個問題在那裏使雙刀，上一個問題盡力替美國辯護，說她『決不要扶持德日來抵制蘇聯』，下一個問題卻肯定蘇聯是比德日還要可怕的侵略國，在邏輯上講來，自然是應該『抵制』，而且也可以『扶持德日來抵制』了。這正是胡適的本心，也是西方民主國的本心，但這樣的本心是不好公開出來見天日的，自然必須掩飾。西方民主國的政策在掩飾，胡適的文章是掩飾的掩飾，這樣你叫他怎麼合得上邏輯來？這苦心是值得體諒的，胡適的文章如要合邏輯，他會一個字也寫不出。

我們請再來看，他所『問題』化了的第二個『問題』。

在公開函的後半段胡適指斥了周鯁生所揭發的第二個事實，『我們相信在聯

「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他這樣說：

老兄這句話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懷疑，因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還有些人覺得這個侵略勢力可能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因為他本錢比德日還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還更偉大，他的勢力比德日極盛時還要普遍。

「一個『心目中』，一個『覺得』，再加上兩個『可能』，於是乎蘇聯便被定成爲『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的『侵略勢力』。這樣可怕的東西，難道還不該用原子彈來轟炸嗎？難道『扶持德日來抵制』，還算錯了嗎？然而僅僅『心目中』『覺得』『可能』，實證主義者的『心目中』也『可能』『覺得』『自己的立腳難穩』，在這兒不消說又應該引用實證了。實證是怎樣的呢？

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入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裏吃的虧，受的侵略，——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堆冷酷

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最要緊的要算是這一節，在這一節裏面，我們的「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表示得比國家主義者的曾琦還要愛國。「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寫得多麼「逼人」呀！然而所謂「這許多事件」，其實就只是中蘇條約締訂的一件。中蘇條約的締訂，在雅爾達會議，英美蘇之間先有了諒解，那時英美因為要爭取蘇聯參加東方戰場，所以同意了後來在中蘇條約所規訂了的蘇聯的要求。那就是所謂「雅爾達秘密協定」。要說這協定、這條約有損中國的權益，應該指斥英美蘇三國，而尤其是締結了這種「喪權辱國」的南京政府，把責任專放在蘇聯身上，那就別有用心了。

平心靜氣地把中蘇條約來研究一下吧，到底哪一點使中國吃了「虧」，哪一點使中國受了「侵害」呢？靠着蘇聯的參戰，把蟠據着整個東北十四年以上的日

本帝國主義驅逐了，我們收復了失地。爲了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蘇聯和我們共同經營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但只有三十年的期限，三十年之後都是要「無償歸屬中國政府所有的。」這就足以使得愛國者胡適那樣傷心嗎？在日本人手裏的時候，不會看見我們這位愛國者傷過一次心，當日本人的勢力在抗戰之前由東北開始侵蝕華北的時候，愛國者不是曾經主張把北平作爲「文化城」，不加抵抗而奉送給日本的嗎？

中蘇條約締訂的時候，我適逢其會也在莫斯科。締訂條約的中國代表宋子文王世杰等，兩次到蘇聯來去都是美國的飛機專送，他們在莫斯科，我只看見他們處處受到盛大的歡迎，胡適所用的「逼訂」的「逼」，我倒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義。老實說，最傷感情的，怕還是條約附件的關於外蒙古獨立的照會吧。外蒙古儘管在事實上已經脫離了中國，我們在情性上還保留着宗主權，但從那一照會承認「外蒙人民投票決定」，我們便把宗主權的虛名也失掉了。當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四日的條約簽字的時候，有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這個消息，說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我那時還有點出自意外。我認爲蘇聯不至於作這樣的要求，這樣會傷我們中國人的面子的。然而後來條約正式公佈，外蒙古的獨立的確是被中國政府承認了。很多比較開明的朋友都爲此事不平，心裏實在慳下了一件難過的東西。一九四六年春季反蘇大遊行，在全國規模地使青年學生被激發了起來，我看，主要的怕還是由於外蒙古獨立這一團大酵素吧？這本是不甚官冕的帝國主義式的感情。外蒙古的獨立只要於外蒙古的人民更爲幸福，我們爲什麼要顧全自己的面子？但這還是從理性一方面來的說法，假使更從事實來的說法，我想在今天就是南京政府中的最反動份子怕也在心裏暗暗歡喜：「幸好外蒙古是獨立了！」你想，假使外蒙古沒有獨立，那不是可以直接參加革命，和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並肩作戰嗎？外蒙古的軍隊是機械化了的，而且還有空軍，在抗日戰爭中曾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假使外蒙古沒有獨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勢力不是更要雄壯的嗎？

在這一點上，我倒看出了蘇聯的領袖們早就沒有干預中國內戰的私心，他們只肯出力幫助外蒙古人民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和幸福，沒有勸他們委曲一下，留在中國的內部作爲革命的酵素。

「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更完全是認棍式的措辭。當然多少還保存了一點客氣，只說「拆洗」，沒有說「洗劫」。但，果真是「整個被」「拆洗」了嗎？假使真是那樣，我保證南京政府不會再開起大兵去「劫收」那片廢墟，美國帝國主義也不會那樣賣氣力支持南京政府了。我不會到東三省去看過，「拆」的程度怎樣不得而知，但斷斷乎不會「拆」而至於「洗」。昨天才被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鞍山，日本人所全力經營出的鋼都，被南京政府「劫收」後，不是一直都還在生產嗎？

如果「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另一鐵幕是不是也籠罩住了日本，南朝鮮、台灣、青島呢？中美商約的簽訂；內河航權的開放；海陸

空基地的普遍設置；在美國的指令之下和敵國日本開始交易，把華北的食鹽，海南島的鐵苗運往日本；在麥克阿瑟的縱使之下日本漁船可以自由的在中國領海撈漁；在麥克阿瑟縱使之下日本警察可以毆殺華僑；美國兵到處橫行，可以在北平公開強姦北大女生而無罪，可以在上海打死臧大咬子而無罪；美國艦隊可以在中國領海內自由演習；魏德邁痛罵南京政府腐敗無能，馬歇爾、司徒雷登都在痛斥中國內政；只要是國美人，無論是怎樣的流氓痞棍都可以指揮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不斷地把剩餘軍火和美元送來讓中國人打中國人，實行日本人所夢想了幾十年而沒有成功的「以華制華」……胡適！你假如也是「人」，是不是也感覺着「這許多事件逼人（你）而來」呢？然而你在拚命替美國辯護，比美國人自己還要辯護得起勁，我知道你已經不是「人」了，至少你已經不是我們中國人的這種「人」了。

不過你有些話也說得很有道理，假如容許我「斷章取義」的話，你的這一段

文字是有價值的：

暴力是終久靠不住的。德國、日本都是眼前的鏡子，一個強國也還需要朋友。無論怎麼強大的霸國，到了鄰舍害怕他，朋友拋棄他的時候，就到了開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極盛時期已經過去了。

這幾句話倒說得很不錯，但可惜你把對象找錯了，我倒要借用來向着你所崇拜的「言論自由的社會」說，向所謂「西方民主國」說。那樣的「民主國」的「言論」本來並不怎麼「自由」，在今天要來掩飾恐怕也相當吃力吧？一邊是黑人沒有公民權，黑人在受私刑，另一邊是十六個同盟共和國有同等權利參加聯盟蘇維埃，一百八十九種民族的人民有同等權利參加民族蘇維埃；一邊是打起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旗子四處去查拿思想犯，另一邊是高張着民族形式的華蓋，接受着多種多樣的文化遺產；一邊是貧者無立錐之地，另一邊是耕者已經有其田；一邊是國家財力集中在八大財閥集團手裏，另一邊是一切生產工具，無論工場或土地，

都爲人民所公有；一邊是拿着並不祕密的原子彈在那兒作威作福四處擴充軍事基地，另一邊是全民合力，埋着頭努力新五年計劃的提早完成；到底哪一邊比較自由，哪一邊比較民主呢？到底哪一邊是靠「暴力」在那兒日謀侵略的「霸國」，哪一邊是值得和他攜手的真正的善隣呢？這些，我們今天在文字上來辯論，人們或許至少可以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但我卻堅決地相信，這一絕對的是非，在你我這一代就可以見諸事實的，雖然你我都已經是上了五十六七歲的人。

你說你以前「夢想」過「新的俄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對不住得很，那只是你一個人的「夢想」而已。蘇聯假使真是照着你的「夢想」做去，真的傻到「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那嗎蘇聯老早成爲了歷史上的名辭了。你自認爲是二十多年的蘇聯的老朋友，失掉了你這個朋友你在爲蘇聯「惋惜」，但我敢於相信，蘇聯人民倒會憐憫你在反抄邱吉爾的

老調，但決不會以失掉你這樣的一位假朋友而認為可以「惋惜」。我本沒有你聰明，但就從不會作過你那樣的「夢想」。「和平」爲的是什麼？爲的是人民的幸福。假使「不恤任何代價」至犧牲人民的幸福以求奴隸的「和平」，那人民是決不會允許的。美國的華盛頓和林肯，也不會實踐過這樣的「夢想」。蘇聯在敵性國的包圍當中維繫了她的光榮的存在，毫無疑問，是因爲她有強大的武力。但她的武力是保衛和平的武力，而不是破壞和平的武力，只要是知道尊重人民利益的人，這點區別應該是明白的。如果真不明白，我們可以盡義務說明，如果要故意歪曲，那就讓他去繼續「夢想」吧。希望他早遲也有夢醒的一天，到那時他不會再說「夢」，或者已經根本不會「想」了。

我也決不「夢想」：美國會「愛好和平」到犧牲他的原子彈。那種「神聖的付託」，除非使它不「神聖」了，它才無所「付託」。這日期也不會太遠的。蘇聯和南斯拉夫，不是都相傳已經有了原子彈嗎？即使眼前沒有，誰能斷定他們將

來也不會有？有的國家，天天拿着原子彈來恫嚇人，而不算是「侵略勢力」，沒有的國家，天天受着恫嚇而不屈，卻算是「侵略勢力」，而且比德日還更可怕，那真真是原子狂的邏輯！就讓它爆炸吧！那樣的東西恫嚇不了人，也煽惑不了人，兒戲的鞭炮而已。

不錯，「中國北邊」有「世界第一長的邊界」，而且沒有設防。果如你所說蘇聯是「侵略國」，蘇聯倒可以隨時來侵略「我們」。怎麼辦呢？是死心踏地把中國送給美國讓他來設防嗎？真是笑話了！老實說，我們與其作些不顧事實的杞憂，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爲法西斯性的敗種，或帝國主義的附庸。我們的國假使成爲人民的國，任何外來的「侵略」，我們都可以免疫。人民的威力比任何原子彈或其他新武器的威力還要大。

然而，我也不相信「歷史要重演」。第二次大戰後的人民力量已不同於第一次大戰後的往日了。各國的人民已經有充分的力量來解決自己的和世界共同的

各種問題。美國的馬歇爾不是早在那兒呻吟，「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臨到了垂危嗎」？明天的美國不是屬於馬歇爾、杜魯門，而是屬於華萊士、泰勒，那是毫無疑問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誰也不能把它扭轉。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香港

歷史要重演嗎？

周鈺生

三十年以前人類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果，軍國主義的中歐帝國集團完全崩潰，自由主義的西方民主國家完全勝利。戰勝國方面，一致認定窮兵黷武的德意志帝國對戰爭負全部責任。因此，巴黎和會強迫德國接受歷史上最苛酷詳而密的媾和條件。主持和會的列強政治家特別注意防止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復活。凡爾賽和約除掉厲行懲罰賠償原則外，尙有防制的作用。和約條款中如調整國境、限制軍備和兵器製造、駐防萊因等等，對於削弱德國的力量，防止侵略勢力復活，在當時也以爲是至當不易之辦法。可是和約剛剛成立，輿論和政策便起反動。威爾遜總統的國際和平政策，因在國中受敵黨攻擊而被推翻，凡爾賽和約根本不爲美國所支持。在美國，乃至在英國，輿論的同情漸漸傾向於戰敗者之德國，人們認爲和約的條款太苛刻

而不公平，甚至認爲根本的無法履行。經濟家從數字上斷定和約條款違反經濟原則，實際執行不可能。歷史家從外交文件中搜尋材料，證明戰爭責任不專在德國。做這類翻案文章，一時成爲時髦，專家學者因此博得盛名，也是不足怪的事。可怪的是戰勝國方面的西方列強，在防制德國侵略勢力復興上，原來立於一條陣綫，乃到了執行和約的時候，他們的政策便分歧起來。經濟利益的立場，政治均勢的考慮，使得有的西方國家不求切實行和約，以防制敵國復興，反而以抑制盟邦，扶植敵國爲國策。其結果是，凡爾賽和約自始即未獲澈底的有效執行，德國逃避或解除和約條款的箝制，獲得機會從事經濟的軍事的復興計畫。等到希特勒上台，新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基礎早已奠定。然而保守主義的西歐政治家尙不省悟歐洲新威脅出現的可怕，還想利用德意志的勢力以抵制蘇聯。到了一九三九年歐洲大危機，德蘇間居然於八月成立中立協約，而歐洲大戰，隨即因波蘭問題爆發，西方民主國家多年對德政策的矛盾和錯誤，在這裏充分表現惡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兩年多，而主要的對德日兩和約，現在還沒訂成。表面上很多的光滑磨於外長會議關於召開和會起草和約之程序問題的爭論，骨子裏則是列強對德對日政策

分歧。他們對於和約各有打算。不復能維持戰時共同對敵政策的精神。自聯合國列強共同作戰以來，他們的宣布而着重之和平政策，是在永久防止德日兩國侵略勢力的復活，免致他們的鄰邦或世界再受威脅。德日兩敵國既經先後無條件投降，列強起草和約自應當本着這個共同大方針進行。可是兩年以來，由於聯合國的列強，尤其美國和蘇聯的對抗，議和政策已不一致。西方民主國家漸有對於解決德日問題，決定兩國的將來，在根本方針上作重行考慮之傾向。人們以為今後歐洲的危險，在於蘇聯之向外發展的野心，後者一方面控制東歐，同時尙圖從中歐向西推進。於是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不在極端削弱德國，而在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復興。這樣一個復興的德意志，自然傾向西方集團，增加民主勢力，而於安定中歐，阻障蘇聯尤有必要。基於這種考慮，則將來對德和約的制定和執行，自然要趨向寬大。這是人們關於對德問題之一種新看法。

特別使我們關心的還是對日本政策的演變，麥克阿瑟元帥管制日本，友邦人士認為成功，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現狀，西方民主社會相當滿意。反之，人們對於戰勝者之中國現狀則頗多失望。在戰爭期間，中國簽字莫斯科宣言，正式進入四強之列，原來出於羅斯福總統之推崇。

當時美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認爲暴日打倒之後，在遠東方面，要靠戰勝的中國做一個安定的勢力。可是勝利之後，人們鑒於中國經濟危險，政治的不安，以及『內戰』的發展情形，乃懷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能期待一個强有力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出現，是否能靠中國作遠東安定的勢力。西方民主國家，爲防止蘇聯向外發展政策活躍於遠東，總是利於有一個對抗的力量。人們既認爲中國無大希望，於是又想到戰前他們曾經倚重過，而戰後仍認爲值得扶持的日本。

總括起來，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人士心目中，今日關於對德日和約問題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戰時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這種思想和政策的反動，現在雖然尙沒有表現於具體的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可是從各方面已經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初步但是很危險的傾向，——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將要重演嗎？這是關係今後世界和平及人類死活之一個重大問題。在大戰期中聯合國列強政治家所表示的一貫的精神是要爲國際永久和平根絕侵略勢力；而戰後厲行管制敵國，使侵略主義者不能恢復軍事的經濟的實力再來威脅他國，則認爲聯合國列

強的共同責任。現在和約尙未訂立，列強政策已呈分道揚鑠之象，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德政策的覆轍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德國一敗塗地，但是不到二十年，她又成爲威脅歐洲乃至世界之最可怕的勢力。那一個大勢力的培養成功，民主國家，尤其英美，不能不說是要負一大部分責任。在遠東方面，戰前日本之強大，得力於西方列強之扶植和縱容也不小。英美尤其重視日本的力量和地位，一般認爲遠東安定的因素。甚至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保守主義的人士，並不主張援助中國，抑制日本侵略行爲，反而利於日本控制滿洲，積極向大陸發展，以牽制蘇聯勢力，因此而犧牲中國領土主權亦在所不惜。七七事變發生以後，西方民主國家仍不肯援華抗日。及到歐戰繼起，日本利用時會，擴大侵略活動到南洋，乃至太平洋全部，以致所有對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列強都感受威脅，那時候悔已無及了。最值得記憶的是，西方列強原來扶植德國，意在回復大陸均勢及抵制蘇聯，而不意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妥協，均勢全破。他們原來想利用日本的強大，在遠東對抗蘇聯勢力，而不意到一九四一年春間，西方列強最危急之時，日蘇間居然訂成中立協約，致一時令人感覺有日德蘇形成聯合陣線，共同對待西方列強之恐懼。對於西方民主社會，那個歷史的教訓應當是够大的了。

人們如果不是健忘的話，在和平政策主張上應當避免再開倒車。聯合國的列強應當一致貫徹激戰時表白的消除侵略勢力之根本政策的精神，以訂立並執行對德對日兩和約。在和約規定之下，大家應當本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之大方針，切實管制兩國，不但全部解除他們的武裝，——軍事的及地理的——並且澈底消滅他們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一切可以助長侵略勢力的因素。現今聯合國的列強間情感衝突，利益爭執的處所很多，尤其美國與蘇聯形成對立之局誠不可諱言，可是外交協商之途徑並未閉塞，聯合國組織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應用之和平機構。國際上現在並沒有真正不能解決的爭端，也還沒有絕對勢不兩立的國家集團。我們並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因此我們不認為現在就有根本變更政策的理由。即令今後世界上真有任何一個侵略國的話，正當的辦法也只是由那些對維持和平特別有責任的聯合國的列強，運用聯合國全體的力量，保持集體安全。而決不可以為着要抵制一個現存的侵略勢力，又來扶植培養另一個潛在的或許更危險的侵略勢力。人們的原意以為如此可以使兩個侵略勢力互相抵消，其實反而會使世界上侵略勢力增多。我們中國向來有所謂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之策，在近代外交上那套舊把戲曾經試過而不見效，有時反招危

險的結果，受人譏評。

聯合國列強爲世界和平定百年大計，眼光要放遠大點，再不可以弄巧反拙了。

附錄二

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

胡適

——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鯁生吾兄：

前幾天我讀了老兄歷史要重演嗎？那篇文章，我頗驚訝我們兩個老朋友對國際局勢的觀察竟相隔離如此之遠！所以我今天寫出兩點不同的意見來，請老兄指教。

第一，老兄此文的主要論點是譴責「西方民主國家」對德國日本的和約政策的根本改變。老兄所謂根本改變，是說西方國家眼前頗「有些人士」看到對德日和約問題的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戰時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

老兄也承認這種傾向『現在尙沒有表現於具體的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只不過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的幾個私人意見而已。我覺得老兄似乎不應該太重看這種個人議論而忽視那些已經正式公表的方案與文件。我試舉美國提出而英法熱心贊成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四十年協約草案，這是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馬歇爾先生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兩次都被蘇聯打消了的。這個協約的主要目標正是一種維持集體安全的武力來長期制止德國的侵略勢力的復活。當初美國政府曾表示，同樣的四十年協約可以適用到日本。這是美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在貝爾納斯先生提出之前，曾經美國參議院的兩黨領袖仔細研究討論過，將來當然可以得參議院的批准。如果我們要判斷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根本政策，這一類的文件似乎更值得我們的研究吧？

我觀察西方民主國家的負責言論與行動，可以作三個判斷：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在這一點上，不但波茨坦會議曾有嚴重的決定，西方國家的朝野主張也是絕對一致的。二、因爲根本不許德日兩國重行武裝，所以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老兄試想想，那有不武裝德日而可以利用他們來抵制蘇俄的道理？

我可以武斷的說：武裝德日是英美法與澳洲加拿大諸國的人民絕對不肯允許的。三、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興。這裏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德國民族有七千多萬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萬人。誰也不能毀滅這一萬五六千萬人。可是誰也不能長期掏腰包來養活他們。所以西方民主國家不能不考慮如何替他們保留一部分的工業生產力，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這不是過分的寬大。爲了根本消滅將來的循環報復，爲了根本維持比較久遠的和平，這種政策是不能避免的。

這三個觀察，老兄認爲有點根據嗎？如果我的看法不算大錯，那麼，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譴責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政策改變。至少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國家在他們管轄的地域之內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第二，老兄在此文裏說：『我們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老兄這句話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懷疑，因爲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還有些人覺得這個侵略勢力可能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因爲他的本錢比德日還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還更偉大，他的勢力比德日極盛時還更普遍。有這

種憂慮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國特別多，因為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為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老兄有什麼法子叫他們不害怕不憂慮呢？

就拿我自己做個例子。老兄知道我向來對蘇俄是懷着很大的熱望的。我是一個多年深信和平主義的人，平常又頗憂慮中國北邊那條世界第一長的邊界，所以我總希望革命後的新俄國繼續維持他早年宣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侵略主義的立場。這種希望會使我夢想新的俄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Peace at any Price）。老兄總還記得，我會用這『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價』一個觀念來解釋蘇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說他從布雷司特—李托烏斯克和約（Brest-Litovsk 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對德不侵犯條約都可以說是『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事件確曾使我對蘇俄開始懷疑，但我總還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因為我的思想裏總不願意有一個侵略國家做中國的北鄰。老兄還記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的演說，我還表示我的一個夢想：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兵士防守！前幾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先生訪問蘇俄與中國，他在重慶下

飛機時發表的書面談話裏，還引我那個中蘇邊界不用武裝兵士防守的夢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裏，也還引我這個夢想的全文。

（頁九一）

老兄，我提起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爲的是要表明我對蘇聯確曾懷抱無限希望，不願意想像這個國家會變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

但是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裏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蘇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蘇俄是世上第一個疆土最大的國家，今日是他的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全世界公認他是兩個最大強國之一。這正是他應該善睦鄰的時期了。勢力是終久靠不住的，德國日本都是眼前的鏡子。一個強國也還需要朋友，需要誠心愛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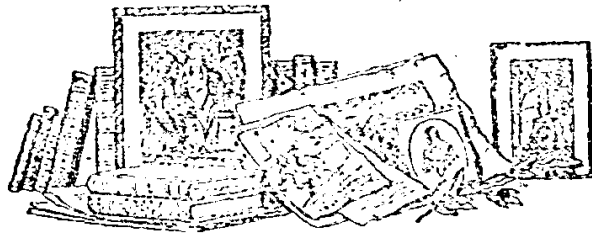
他的朋友。無論怎麼強大的霸國，到了鄰舍害怕他，朋友拋棄他的時候，就到了開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極盛時期已經過去了。

我拋棄了二十多年對蘇俄的夢想，我自己很感覺可惜。但是我觀察這幾年的國際心理，這樣從殷勤屬望變到灰心，從愛護變到害怕憂慮，恐怕不止是我一個人。即如老兄，難道你真不承認這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嗎？老兄試回想你我兩人在五六年前對蘇俄那樣熱心的期望，試回想我們當時親眼看見的西方民主社會對蘇俄那樣真誠的友誼，——我們不能不惋惜：蘇俄今日被人看作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真是蘇俄自己的絕大不幸，自己的絕大損失了。

以上討論的兩點，我很誠懇的盼望老兄坦白指教。

胡適 三七，一，二十一夜





蘇聯文學叢書

鋼鐵是怎樣練成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益譯
被開墾的處女地	梭羅詞夫著 李立譯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夫著 曹靖華譯
城與年	斐曹定著 曹靖華譯
索特	列昂諾夫著 華秋斯譯
前線	考納楚克著 聯伊譯
對馬	普里波衣著 曹哲譯
在苦難中行進	A·托爾斯泰著 鄭伯華譯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林達耶夫著 林淡秋譯

· 另有多種在排印中 ·

中蘇文化之交流

著者 郭沫若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五元九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上海江甯路二〇〇弄三九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47)(Q242)S.0001—3000(P.190)

34

547 Q242

基本定價 \$5.90

~~70001~~

70001